

# 歐盟政治研究中 理論方法之分類與比較

黃偉峰

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

歐洲聯盟研究隨著不同學科研究者的投入已趨向科際整合，其研究方法也呈現多樣化。然而學界對於日益多樣化的歐盟政治研究仍缺乏系統性的分類與比較，致使理論之間的爭議流於形式，徒增研究者之困擾。有鑑於此，本文首先界定歐盟政治之研究範疇，進而依研究單位、分析層次、本體論，和知識論將歐盟政治理論分成十六類研究取向，並討論各類理論之代表作。然後再依本文分類架構比較分析目前歐盟政治研究的主要理論爭議。透過有系統的整理，本文在相當程度已釐清歐盟政治理論間的假爭議，進而提供國內歐盟學界一個完善的研究方法工具箱。

**關鍵字：**歐洲聯盟，分析層次，新功能主義，自由派政府間主義，歷史制度主義，多層級治理取向

## 一、前言

晚近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 簡稱 EU 或歐盟) 之研究已蔚然成風。隨著不同學科背景的研究者之投入，歐盟之政治、法律、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安全、環保、能源，和對外關係等問題皆有廣泛且深入之討論。同時歐盟研究也趨向科際整合，研究方法也多樣化。以歐盟的政治研究為例，不

但研究的對象和層次有所不同，就連研究取向也是五花八門，莫衷一是。<sup>1</sup> 政治學者在面對日新月異的歐盟術語及學說之際，如何尋找一個適切的研究取向便是一大挑戰。

早期學者針對歐盟研究取向之討論大多圍繞著聯邦主義 (federalism)、功能主義 (functionalism) 及溝通理論 (communication theory)。晚近針對上述理論之批評和修正又引發了新功能主義 (neo-functionalism) 及新現實主義 (neo-realism) 之爭議；自由派政府間主義 (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m) 及歷史制度主義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之辯論；國家中心取向 (state-centric approach) 與多層級治理取向 (multi-level governance approach) 之交鋒。上述理論大多解釋歐盟之統合過程，但也有探討歐盟的組織運作及政策決定模式。儘管理論的推陳出新代表著歐盟政治研究的逐漸成熟，但是研究取向的快速增加已迫使學者在處理問題上必須有所割捨，甚至重新組合各家之言，開創特殊的研究途徑。然而欲適當地運用各家理論，學者必先有系統地瞭解現有的研究取向及其限制。

在國外，S. Hix 曾有系統地去整理以歐盟政治為對象的研究取向，並依照本體論 (ontology) 及方法論 (methodology) 兩個面向將各家理論予以分類 (Hix, 1994: 1-30; Hix, 1998: 38-65)。雖然 Hix 對「國際關係」與「比較政治」領域之區分，以及對「統合」與「政治」之區隔受到其他學者的嚴厲批評 (Hurrell and Menon, 1996: 386-402; Hix, 1996: 802-804)。但是 Hix 的論文卻提供研究歐盟政治者一個方法論入門。在國內，純粹探討或巧思應用歐盟政治理論之文章實在少之又少，更遑論對其研究方法的系統整理。張亞中教授曾以政府間主義和超國家主義的互動來分析歐洲統合；王國璋教授則依功能主義闡述西歐核能共同體之發展（張亞中, 1998；王國璋, 1994: 51-71）。洪德欽教授雖對歐盟統合的法律架構及實踐經驗有詳細的討論，但是對於理論方法之探討則僅偏重於早期的區域統合理論之介紹（洪德欽, 1998: 1-85）。最近盧倩儀教授的大作則評析新功能主義、歷史制度主義，及自由派政

1 在本文，「研究取向」與「理論方法」之用法一致，故交互使用。嚴格來說，有些歐盟政治之理論性文章之理論化程度不高，勉強稱得上是種研究取向。但為了廣納各類型理論，也求表達之方便，故兩者交互使用。

府間主義等區域整合理論（盧倩儀，1997: 27-44）。儘管有多位教授的努力，但目前國內的歐盟研究仍未能將日趨精緻的研究方法納入範疇。例如多層級治理取向、政策網路取向（policy network approach）、理性抉擇制度論（rational-choice institutionalism）、權力指標分析（power index analysis）、博奕理論（game theory）、談判理論（bargaining theory）、結構理論（structural theory）、新馬克斯主義（neo-Marxism）、多元主義（pluralism）、比較政治體系（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及新制度論（new institutionalism）等諸多研究取向皆對歐盟政治的運作有獨道的見解。本文的目的便在於有系統地分類與比較這些應用在歐盟政治的研究取向。依據本文分類的方式，讀者將可理解各種理論背後的假設和分析主體及層次，不再困惑於理論間的爭議。另一方面，本文做為理論方法之分類比較，目的並不在於將所有歐盟研究文獻納入論述範圍。作者僅依本文的分類方式，將相關文獻擇其代表著作加以評析。因此並非所有歐盟相關著作都已納入本文。但運用本文的分類架構卻有助於釐清歐盟相關著作之理論與方法的本質，也有助於澄清目前歐盟政治研究著作之理論性爭議。

本文共分五節。除第一節前言外，第二節界定歐盟政治的研究範圍。第三節探討歐盟政治研究中針對理論方法的分類方式。筆者主張依照研究的單位、分析層次、方法論，及本體論觀點等四個面向來進行分類。第四節則依照本文之分類方式，逐一介紹十六種理論型態的代表作。第五節藉著主要研究取向之比較，指出目前歐盟政治研究理論爭議之本質。第六節則留做結論。

## 二、界定歐盟政治的研究範圍

將「歐盟政治」視為一個研究主體是一件非常吊詭的舉動，因為它預設了「歐盟政治」的研究範圍是相當穩定的。然而別說「政治」一詞的概念招致無盡的爭議（essentially contested），<sup>2</sup>就連歐洲聯盟的本質（nature）也

2 一個概念若招致其使用者無盡地爭議其正確的使用方式時，則稱做“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見 W. B. Gallie, “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s,” *Proceedings of Aristotelian Society*, 1956, pp. 55-56.

常因其演變仍在進行中而無法精確的界定。這的確造成歐盟政治研究者許多困擾。因為如果研究範圍無法勾勒清楚，則任何研究主題都有可能擴散成爲「歐盟政治」之研究範疇。因此，欲比較分析其研究取向，首先必須界定歐盟政治的研究範圍。

雖然「政治」的概念招致無盡的爭議，但多年下來對政治的研究範圍也逐漸有所共識。不論我們採取 D. Easton 的定義，即政治是社會價值的權威性的分配 (Easton, 1965)，或是延用 H. D. Lasswell 的說法，即政治學是探討誰獲得了什麼，以及何時和如何獲得之現象 (who gets what, when and how) (Lasswell, 1936)，政治研究的狹義範圍似乎被限定在研究政府和國家 (state) 以及它們和社會 (society) 的權力互動。雖然我們不能說政治學僅止於探討上述的狹義範圍而已，但是卻很少人會去爭辯政府、國家及其與社會的權力互動並不屬於政治的研究範疇。本文不擬也不宜對「政治」的定義做詳盡的介紹評析，因爲那將需要另一篇論文的長度。依目前的需要，我們暫時以上述狹隘的定義爲出發點，簡單勾勒出政治研究的範圍，俾便稍後研究取向之討論。

雖然「政治」一詞的定義本身之爭議性頗大，但至少其核心研究範圍尙稱穩定。反觀歐洲聯盟的性質卻因其仍在演變中而無法精確的辨識。對「歐盟」本質的混淆散見於學者對其描述時所使用之語言。例如，W. Wallace 曾描述歐盟「比一個聯邦不足，比一個建制有餘」(less than a federation, more than a regime) (Wallace, 1983)；又如 T. Risse-Kappen 使用「奇怪野獸」(the strange beast) 一詞來描述歐盟 (Risse-Kappen, 1996: 53-80)；B. Laffan也指出研究者必須面對歐盟本質常介於兩種概念之間 (the “betweenness” of the EU)。<sup>3</sup>到底歐盟體系是強或弱呢？它是否能持久或終將瓦解呢？它是歐洲秩序的根本還是分裂的來源呢？如果與傳統國家相比，歐盟的政治權威、能力、資源及正當性似乎較爲脆弱。但若與國際組織相較，歐

3 Laffan 認爲歐盟介於政治和外交之間，介於國家與市場之間，介於政府與治理之間。見 B. Laffan, "The European Union: A Distinctive Model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5, No. 2, 1998, pp. 235-253.

盟體系似乎又較有活力且完整。又如果以代議民主的標準來衡量，歐盟似乎遠離基層而不太民主。但若以傳統外交及權力平衡體系的眼光來看，歐盟卻又奠基於法律、制式程序，及較為開放的體系。因此隨著觀察角度的不同，對歐盟本質的描述亦有差異。更糟的是，歐盟統合的過程仍屬進行式。根據 Laffan 的說法，歐盟至少在下列五個面向上尚未定型：即憲政秩序、地理界限、制度平衡、決策規則和功能範圍。所以他建議研究者，應該揚棄歐盟是一個靜態實體 (something) 的思維，而應時常將歐盟視為一個正在成型 (becoming) 的體系 (Laffan, 1998: 241)。也正因為此，Wallace 在其近書中總結地認為，歐盟是一個處於不穩定的均衡狀態，且無國家基礎的政府 (government without statehood with unstable equilibrium) (Wallace, 1996: 439–460)。

研究者對歐盟本質的含糊性有一種極端的反應：既然歐盟不是國家，也不是國際組織，則它必然是一個獨一無二 (*sui generis*) 的政治實體，因此必須藉著獨一無二的研究方法來探討。<sup>4</sup> 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既然歐盟是獨一無二的，則將它與其他政治體系做比較，可能造成「分析層次的問題」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Singer, 1969)。此外，如果歐盟被視為獨一無二的案例，則任何的理論假設的建構都會遭到質疑。因為從一個特例所發展出來的理論假設必然無法通則化，而去適用於其他國際組織或政治體系 (Pollack, 1997: 1–5)。<sup>5</sup> 最後，由於歐盟是獨一無二的，故研究歐盟政治應揚棄舊有概念，進而創造新的概念、名詞、分類及假設以免混淆。P. C. Schmitter 就曾對歐盟統合終點進行分類，並以擬似拉丁文標示：如 *stato/federato*, *condominio*, *confederatio*，和 *consortio* (Schmitter, 1996)。其目的不外乎區別傳統概念中的 *state*, *federation* 和 *confederation*。據此，Schmitter 也強烈暗示歐盟統合的終極實體絕不是我們所熟悉的概念。

然而，承認歐盟是獨一無二的政治實體，並不表示我們必須使用獨一無

4 Sandholtz and Zysman 一向反對直接去驗證不同的理論。因為歐盟獨特的演變歷程無法做為檢證理論通則的基礎。見 W. Sandholtz and J. Zysman, “1992: Recasting the European Bargain,” *World Politics*, Vol. 42, 1989, pp. 95–128.

5 亦可自下列網址取得：[《http://www.pitt.edu/~ecsa101/n1debate.htm》](http://www.pitt.edu/~ecsa101/n1debate.htm), pp. 6–8.

二的方法去研究。早期第一、二代區域統合理論大師 K. Deutsch, E. Haas 及 J. Nye 等人，便將歐盟置於全球統合過程中的一環，故可以與其他區域組織相互比較 (Deutsch et al., 1957; Hass, 1958; Nye, 1971)。然而隨著歐盟演變的複雜化，歐盟研究越趨狹隘且孤立於其他區域統合研究之外。這種過分重視單一案例的研究，已使得研究者喪失許多機會去借重其他學科之研究方法。<sup>6</sup> 例如，以國際建制理論 (international regime theory) 去探究歐盟組織規範如何影響會員國的互動和合作 (Krasner, 1983)。以政策網路的架構去分析歐盟政策制定；以「協和式邦聯」 (confederal consociation) 的概念去界定歐盟的性質等研究皆值得重視 (Chryssochou, 1995: 279–305)。此外，即使歐盟是個獨一無二的案例，我們仍有許多方法去增加案例的數目。在面對單一案例時，King, Keohane 及 Verba 便建議降低觀察的層次 (King, Keohane and Verba, 1994)。例如，就歐盟整體而言雖是個特例，但是歐洲法院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ECJ) 却有數百個判例 (Sweet and Caporaso, 1998)。歐洲議會 (European Parliament, EP) 議員之記名投票也有數千次 (Kreppel and Tsebelis, 1999: 933–966)。這些為數甚多的觀察點雖是歐盟體系層級的案例，但卻是比較分析的基本材料。這也是目前歐盟研究的趨勢：即將歐盟視為「多重層級的政體」 (multi-level polity) (Mark, 1997: 3–4)。於是不同層級的政府組成及權力變遷可與聯邦或邦聯制國家比較。換句話說，歐盟雖是獨一無二的案例，但這個事實並不足以阻礙我們從事比較分析及理論建構。因此，目前迫切所需的不是建立一套獨一無二的分析架構去研究歐盟，而是釐清那些理論架構，在何種條件下，較適合處理何種歐盟的政治問題。<sup>7</sup> 這種需要迫使研究者必須針對各種理論架構的分析層次、研究單位、方法論，及本體論有所分類，才能有系統地瞭解它們解釋背

6 Moravcsik 認為直至 1990 年區域統合理論仍自我封閉在自己的學門內，不受外來理論影響，A. Moravcsik, “Debate: Does the European Union Represent an N of 1?” 1997, *ibid.* 網路版, p. 5.

7 就此看法，筆者與 Sandholtz 的見解一致。見 W. Sandholtz, “Membership Matters: Limits of the Functional Approach to European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4, No. 3, pp. 403–429.

後所援引的內在邏輯和理論本質。而理論方法的分類工作正是下一節討論的主題。

但在結束本節的討論前，我們可以簡單地將歐盟政治的研究範圍界定為：探討歐洲聯盟法定界限內之歐盟常設機構、會員國政府，及社會間的權力互動。雖然歐盟法定界限仍有擴充的可能性，但依目前條約的規定，歐盟地理界限包括荷、比、盧、法、德、義、英、西、葡、愛、希、丹麥、瑞典、奧地利，及芬蘭等十五個會員國。至於歐盟功能界限則依歐盟的諸多條約和法律規定為準。而會員國政府則主要是指中央政府，但是地方政府及政府設立之外圍機構亦包含在內。所謂「社會」則包括會員國內或超國界之工會、商會、政黨、跨國公司、利益團體、弱勢團體，及歐洲公民等等具有影響會員國政府或歐盟政策之團體或其組成份子。歐盟常設機構主要是指歐洲高峰會、執委會、歐盟理事會、歐洲議會和歐洲法院，但也包括其下常設之委員會和授權組織。至於權力（power）的定義筆者取其窄義，即使人為其所不願為的力量（Dahl, 1969: 80）。仔細來說，A 對 B 有權力（A has power over B），如果：(1) A 可以影響 B 的選擇和行動；(2) A 可以使 B 之選擇及行動靠近 A 之偏好；(3) A 有能力克服 B 的反對；(4) 上述三項有關 A 與 B 之權力關係有持續的傾向。而反映在現實中，權力可以下列五種形式展現：即武力（force）、說服（persuasion）、權威（authority）、脅迫（coercion），和操縱（manipulation）（Allison, 1996: 396–399）。雖然權力的概念尚包含其他面向，例如促使人不敢做其想做之事情，或更進一步的促使人不敢想其原本想做的事情（Lukes, 1974; Bachrach and Baratz, 1962: 947–952）。但是觀察「不作為」（non-action）是有其困難的，故暫將這種情況排除。不過這並不表示這種權力關係毫無檢證的可行性。<sup>8</sup> 實際上，當我們探討歐盟機構，會員國政府與社會的權力互動時，其所涵蓋的脅迫和操縱形式也隱約涉及到這種面向的權力關係。而筆者認為上述的定義應該足以包含歐盟政治的所有研究面向，但又不流於漫無邊際的虛無境界。

<sup>8</sup> 實證研究這種「不作為」的權力關係，以 Gaventa 研究阿帕拉契山谷的工人反應最著名。見 J. Gaventa, *Power and Powerlessness: Quiescence and Rebellion in an Appalachian Valley*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2).

### 三、歐盟政治研究中理論方法之分類方式

在政治學中研究取向之分類方式幾乎與研究取向本身的數目一樣的眾多。G. A. Almond 在其專書標題 *A Discipline Divided: Schools and Sects in Political Sciences* 便點明政治學研究方法之多樣分歧 (Almond, 1990)。為了節省篇幅，本文不擬檢討所有政治研究取向之分類方式。<sup>9</sup> 僅就「歐盟政治」之研究取向的分類方式進行說明。早在 1994 年，Hix 便區分歐盟政治研究中的兩大理論流派，即國際關係和比較政治。然後再依本體論中代理人 (agent) 和結構 (structure) 兩個面向來區別分析主體。代理人主體下又可區分理性行動者 (rational actor) 及團體理論 (group theories)。而結構主體下則細分成結構中立理論及結構主動理論 (structure-active theories) 二種。<sup>10</sup> 於是 Hix 區分八類研究取向。姑且不論 Hix 是否將的各家理論置於正確的類別，其分類方式本身已受到多方的挑戰。首先，Hurrell 和 Menon 認為歐盟政治不能如 Hix 構思般地被區分成「統合」與「政治」兩部分，因為兩者是一體兩面，相互影響，不易分割。所以 Hix 將「統合」劃歸於國際關係理論的解釋範疇，而政治體系歸於比較政治範疇的論點並不恰當。其次，Hurrell 和 Menon 也認為在歐盟內國家間的權力互動仍居最重要地位。因此，傳統上研究國與國之間互動的國際關係理論仍具解釋力量。換言之，歐盟並非正常的政治體系，故捨國關理論而獨厚比較政治方法必有偏差。最後，

9 有關政治學研究取向之分類方式，如 Blondel 區分規範的、行為的，及結構的研究取向。又如 March 和 Olsen 區分情境的、化約的、功利主義的、工具性的和功能性的研究取向。Almond 也以方法論及意識型態兩個面向做為分類標準。參考 J. Blondel, *Thinking Politicall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6); J.G. March and J.P. Olsen,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 The Organizational Basis of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9); Almond, 1990, *ibid.*, pp. 13–31.

10 Hix 將理論分成八類，即國際關係學門下的多元主義論者 (pluralist)、現實主義論者 (realist)、結構主義論者 (structuralist)，和制度論者 (institutional) 四類。比較政治學門下的多元主義論者、理性抉擇論者 (rational choice)、社會學派 (sociological)，和新舊制度主義論者 (old and new institutional) 等四類。S. Hix, “The Study of European Community,” 1994, *op.cit.*, pp. 2–3 和 p. 23.

即使歐盟可以像正常政治體系般的運作決策，任何公共政策分析皆不能不考慮外在國際因素。例如，一國之貨幣政策不得不考量國際資本流動因素。所以，運用比較政治方法研究歐盟政策時仍須借重國際關係理論（Hurrell and Menon, 1996）。晚近所發表的論文已融合國際關係及比較政治之研究方法。故 Hix 將國際關係與比較政治區分的實際效用已不大了。<sup>11</sup>

然而，歐盟演進至今已形成多層級的治理體系（multi-level governance），故在分類上不得不將分析的層次有所區分。J. Peterson 曾將歐盟決策區分成三個分析層次：即超體系層次、體系層次，和次體系層次。超體系層次所做的決定型態是創造歷史（history-making）；主要行動者是部長理事會、會員國政府間會議，和歐洲法院；其決策理性（rationality）屬於政治性和合法性的考量。體系層次所做的決定型態是制定政策（policy setting）；主要行動者是部長理事會和永久代表委員會；其決策理性是屬於政治性、技術性，和行政性的考量。次體系層次所做的決定型態是塑造政策（policy-shaping）；主要行動者是執委會、及其下設之委員會，和理事會下設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s）；其決策理性是技術性、共識性，和行政性的考量（Peterson, 1995a: 69–93）。雖然 Peterson 將目前歐盟決策分成三個層次，但為求理論分類之簡明扼要，筆者僅分成超體系和體系兩個分析層次。原因是如果將歐盟視為一個完整體系，則次體系的要素皆包含在體系內。但超體系層次旨在探討歐盟體系的演進。換言之，它是超越歐盟體系本身而試圖解釋體系的變遷。基於上述理由將歐盟政治分成兩個分析層次似乎足夠了。

Hix 的另一個分類主軸是代理人和結構主體的區分。筆者原則上同意這樣的區分，但必須指出所有的社會科學理論皆隱含著「代理人—結構問題」（agent-structure problem）的解決方式。<sup>12</sup> 研究者對兩者關係的假設終將

11 例如，將歐盟視為多層級治理的結構已大多為國際關係和比較政治學者所融入，兩者差異不大。見 T. Risse-Kappen, "IR Theory,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and the EU,"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4, 1996, p. 62.

12 所謂「代理人—結構問題」是建築在社會生活的兩個事實上。第一，人類及其組織是有目的意識之行動者，而且他們的行動足以再生或轉變其所存在的社會。第二，社會是由社會關係所構成的；而這些社會關係足以規範行動者間的互動。綜合而論，代理人和社會結構是理論互賴的實體。分析行動者之行為便隱約假設行動者存在於某種社會關係；分析社會

決定其理論的型態。由於代理人主體和結構主體是互為指涉實體 (mutually implicating entities)，所以正確的區分應是個人主義觀的 (individualistic) 研究主體和整體全面觀 (holistic) 研究主體。前者認為研究主體可以被化約成其基本組成份子，而組成份子之加總便構成了研究主體。主體之架構及規範對組成份子而言是外生中立的，頂多僅構成外在限制而已。相對地，整體全面觀的研究主體是不可化約的。其組成份子的加總並不等於研究主體本身。於是主體的本質已超脫其組成份子，並且具有獨立自主性。主體的架構不但對其組成份子形成外在限制，甚至界定其角色、認同、偏好和利益。在此組成份子是受到結構所驅使，其行動自主性備受質疑。由於這樣的分類方式預設了代理人與結構間的關係是相互建構的 (mutually constituted)，<sup>13</sup> 故在個人主義觀之下，代理人的角色及定位仍有可能受到其處的結構環境所影響，只不過這種影響是長期社會化的結果。相對地，在整體全面觀之下，雖然代理人的角色、偏好，甚至行動皆受制於所處的結構環境，但代理人間的長期互動也有可能改變結構環境。

Hix 的分類方式還有一個可議之處：即將代理人主體再細分為「理性行動者」及「團體理論」。他的細分標準是理性行動者理論使用「形式模型」 (formal model) 而團體理論者大多使用「非符號模型」 (Hix, 1994: 3)。然

結構也隱約假設在其中的行動者之性質。問題便出在我們缺乏顯而易見的方法去概念化代理人及社會結構這兩個實體及其對應關係。見 A. E.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3, 1987, pp. 337-338.

13 根據 Wendt 的說法，「結構型態理論」是種「分析理論」 (analytical theory) 而不是「實體理論」 (substantive theory)。換句話說，「結構型態理論」並不是解釋某一特定社會體系中代理人與結構具有何種特徵。做為一個分析理論，結構型態理論承認代理人和結構雖在本體論上可以區分，但是他們卻也同時是互相建構的，共同解釋社會現象。一般將「結構型態理論」歸屬於 A. Giddens 的理論架構。其實，結構型態理論所含蓋的範圍極廣，包括 P. Abrams, R. Bhaskar, P. Bourdieu, 和 D. Layder 等之著作。這些理論家不見得使用「結構型態理論」之標示，但其著作乃展現代理人與結構互相建構的特性。見 Wendt, 1987, *ibid.*, pp. 355-361。有關「結構型態理論」參考 A.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D. Layder, *Structure, Interaction,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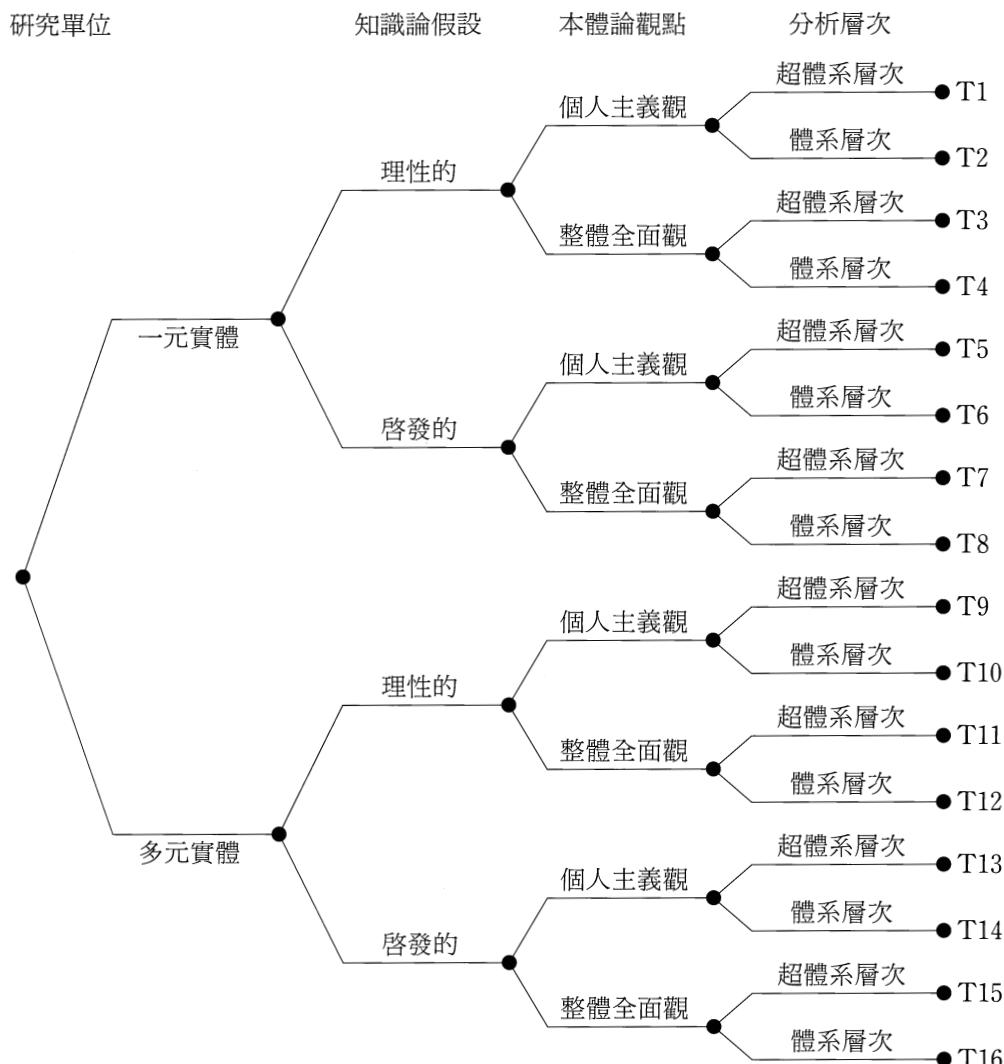
而熟悉理性抉擇理論者皆知道團體理論所使用「符號模型」的複雜程度絕不亞於理性行動者之理論 (Friedkin, 1998)。因此 Hix 這裡的分類並不恰當。其實 Hix 在此的分類應該屬於知識論 (epistemology) 層次的問題。也就是說，研究者對於知識如何取得及如何評估的基本假設為何呢？從知識論的角度，筆者區分「理性假設」(rational hypothesis) 與「啟發假設」(heuristic hypothesis)。理性假設論者基本上認為對於社會知識的取得必須假設社會組織或行動者之行為是有其邏輯一致性的 (logical consistency)。換句話說，不論是代理人或結構主體的解釋都有一定的理性脈絡可循。在此「理性」可以被廣義地定義為邏輯一致性，或狹義地定義為目標取向及自利動機驅使的行為。反觀啟發假設論者並不認為社會知識的取得必須假設社會組織運作或行動者之行為必定具有邏輯一貫性的。他們的運作或行為可能是非理性的。換言之，影響社會現象者不一定有脈絡可循，反倒是透過不同因素的分離重組而使社會真象明朗化。

最後筆者必須區隔研究單位的性質。一般來說，研究單位可分成一元實體 (unitary entity) 或多元實體 (plural entities)。例如，在國際關係理論中常見的研究單位如民族國家 (nation states) 可被視為一元實體。猶如一個自然人般可以從事有意識的決策活動。但民族國家也可被認為是由許多團體組合而成，是個多元實體。其政府的決策也受到不同利益團體、政黨、非營利組織、跨國公司，或有力人士等之影響。根據以上對分類方式的討論，我們可以將歐盟政治之各種研究取向依照其研究單位、知識論之假設、本體論的觀點，及分析層次區分成十六個研究取向之類別。

#### 四、研究歐盟政治的十六種理論型態

如圖一所示，第一類 (T1) 代表的理論型態是將民族國家視為一元決策實體並從事理性自利的考量；而其彼此間的互動便足以解釋歐盟統合。國際社會的規範對國家而言是外生中立的，頂多僅構成外在限制。但不論如何，歐盟統合的方向和速度完全控制在會員國手中。而彼此所達成的統合協定僅是反映會員國自利考量下的「最大公約數」(the largest common denomina-

圖一：歐盟政治研究的十六類理論型態



tor) 罷了。據此，T1 應包括國際關係中的現實主義或新現實主義。應用在歐盟研究上，則以政府間主義（intergovernmentalism）為主軸。<sup>14</sup> 最近 A.

14 有關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的論述，參考 R.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應用在歐盟研究上以政府間主義最重要，參考 P. Taylor, "Intergovernmentalism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in the 1970s: Patterns and Perspectiv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1982, pp. 741-766.

Moravcsik 發展出來的「自由派政府間主義」放棄民族國家在形成偏好時是單一實體的假設 (Moravcsik, 1993: 473–524)。取而代之的，是許多國內利益團體爭取界定國家的利益和偏好。一旦國家利益和偏好匯集完成，並且取得共識，則在超體系的對外談判上，各國政府仍被視為單一決策實體，猶如 R. Putman 的「二重賽局」(two-level game) 般地從事談判，並藉此尋求國家最大利益的協議 (Putman, 1988: 427–461)。另外，F. W. Scharpf 則用雙人非合作賽局解釋歐盟的統合如何陷入「決策聯動陷阱」(joint-decision trap)。於是造成負面統合的速度 (negative integration，如去除貿易障礙) 快於正面統合 (positive integration，如建立歐盟社會福利制度)。這種不對稱的統合現象實肇因於歐盟在重大議題上採行的一致決原則。透過歐盟理事會和政策社群的利益結合得以衝破一致決門檻。可是一旦統合之後卻難以將其去除 (Scharpf, 1988: 277–304; Scharpf, 1996)。G. Schneider 和 L-E Cederman 則探究資訊充足與否對歐盟統合的影響。運用理性抉擇模型並假設會員國是單一自利實體，他們認為歐盟「停停走走」(stop and go) 的統合過程實在是因為較遲緩的會員國 (laggards) 威脅退出歐盟而迫使資訊不充分的其他會員國讓步。當其威脅不具公信力時，則統合步伐加快 (Schneider and Cederman, 1994: 633–662)。

如果我們一切遵循 T1 的樹系，但在最後分歧上選擇以歐盟體系為分析層次，則可得 T2 類的理論型態。T2 的研究重心放在歐盟政治體系。例如，執委會、部長理事會、歐洲議會和歐洲法院之權力變遷和政策制定等皆是 T2 研究範疇。但 T2 仍假設體系內之歐盟機構是單一決策實體從事理性自利考量。其權力互動便成為分析焦點。T2 類型的研究取向以「理性抉擇制度論」(rational-choice institutionalism) 為代表。應用在歐盟上如 G. Tsebelis 研究歐洲議會之「條件式設定議程權力」(conditional agenda setting power) (Tsebelis, 1994: 128–142)。K. Herne 和 N. Nurmi 研究歐洲議會及部長理事會之權力指標的變化 (Herne and Nurmi, 1993)。G. Garrett 以理事會、執委會和歐洲議會的互動來解釋歐盟採行單一市場之決策過程 (Garrett, 1992: 553–560)。J. Bendar, J. Ferejohn 和 G. Garrett 三人則探討歐盟機構的水平互動如何影響歐盟與其會員國的垂直關係 (Bednar, Ferejohn, and

Garrett, 1996: 279–294)。而 Hosli 的一系列文章則探討歐盟決策規則的變遷對歐盟會員國和歐洲議會之權力的影響 (Hosli, 1995: 351–370; Hosli, 1996: 255–273; Hosli, 1997: 351–366; Hosli, 1999: 371–391)。另外 R. Johnston 和 I. Mclean 則辯論權力指標的測量方法與英國在歐盟相對權力的變遷 (Johnston, 1995: 245–254; Garrett, 1995: 563–568)。最近，A. Kreppel 指出「合作程序」和「共同決定程序」的施行是否提升歐洲議會之相對權力，端視歐洲議會內部政黨團結與否和修正案之性質而定 (Kreppel, 2002: 784–813)。

如果僅將研究單位改成多元實體，其餘則依照 T1 的分類，則我們可得 T9 理論型態。T9 雖認為超體系的國際社會等於其組成份子之加總，但卻認為組成份子不僅是民族國家而已。國際社會尚包括非國家和非政府的團體組織，例如跨國公司、國內外利益團體、國際組織、跨國工會及商會，甚至有影響力的個人等。這些組成份子的互動才足以解釋歐盟的變遷。不同於 T1，T9 不但認為民族國家在形成偏好時受到不同團體的影響，它更認為即使在超體系互動上，民族國家並不居於主導地位，甚至在許多情況下其影響力根本不及其他組成份子。早期 K. Deutsch 提出的「交流主義」(transactionalism) 和後來發展出來的「跨國關係」(transnational relations) 取向和跨政府關係 (transgovernmental relations) 取向均以多元實體為研究單位 (Keohane and Nye, 1971; Deutsch, 1957)。「交流主義」強調歐盟各國社會的個人透過交流溝通逐漸形成一種「共同體的意識」(a sense of community)。「跨國關係」取向則假設至少有一個非政府的行動者 (如跨國公司等) 在跨越邊界關係上扮演著重要角色。於是非官方行動者與民族國家和國際組織之互動便可被用來解釋歐盟的變遷。跨政府關係取向則強調會員國次級政府之跨國界互動的重要性。例如，D. Cameron 認為跨國行動者的結合是解釋經濟暨貨幣同盟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EMU) 的必要條件。<sup>15</sup>

15 歐盟的經濟暨貨幣同盟 (EMU) 來自 1992 年馬斯垂克條約的明文規定。單一貨幣將於 1999 年 1 月 1 日實施。其中參與單一貨幣 (歐元) 之會員國應謹守經濟上的趨合條件，即維持物價穩定 (通膨率不超過三個最佳經濟成長會員之正負 1.5%)；堅持預算紀律 (政府年度

特別是德國並非單一行動主體。德國外長 Genscher 最初贊成法國提議早日完成 EMU。但德國財政部和聯邦銀行強烈要求經濟上的「趨合條件」(convergence criteria)。故不同層級的德法部會間的協商早在正式的政府間談判之前便已進行，因而設定未來談判的議程。不過在知識論上，「交流主義」和「跨國關係」取向並不全然是遵循理性自利的考量。例如「交流主義」強調個人如何社會化而形成「共同體意識」。但是「社會化」過程可能是理性和非理性互動所造成，因此部分應用「交流主義」的文章有可能屬於 T13 的理論型態。同理，應用「跨國關係」取向的文章也可能採取非理性的或啟發性的角度切入。在此情況下應被劃歸為 T13 類。

T13 與 T9 之不同處在於理性假設的堅持與否。T13 容許理性假設之外還存有其他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在國際關係理論中以「互賴理論」(interdependence theory) 較接近 T13 類型的理論。互賴理論認為全球化的趨勢已衝破民族國家疆界藩籬。因此國家並不是唯一的研究單位。此外，各國在面對全球化的衝擊已無法單獨解決因彼此密集互動所產生的共同問題。<sup>16</sup> 然而「互賴理論」並不因此而認為國家間的合作和統合是無可避免的。延伸該理論，於是歐洲統合過程並不依照任何既定的邏輯，並且充滿了不可預料的變數，「互賴理論」認為一個緊密互賴的國際社會之權力是分散的。唯有遵循「相互」原則 (mutualism) 協調彼此政策才能解決日益複雜的共同問題，但「互賴」並不保證行動者一定會理性地去制定政策。往往解決「互賴」問題的共同政策並非理性自利假設可理解的 (Chryssochou, Tsirisizelis, Stavridis and Ifantis, 1999: 27–30)。應用「互賴理論」於歐洲統合者仍居少數。其中

預算赤字不超過其 GDP 的 3%；政府債務不超過其 GDP 的 60%)；參加「歐洲匯兌機制」(ERM) 至少兩年以上且未造成其幣值重貶；利率趨合(長期利率不超過三個最佳經濟表現會員國之利率的 2%)。到了 1999 年 11 個會員國加入 EMU，希臘則隨後加入。目前 EMU 共 12 個會員國。見 D. Dinan, *Ever Closer Union* (London: Lynne Rienner, 1999), pp. 454–482; D. Cameron,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in T. Risse-Kappen ed., *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 Non-State Actors, Domestic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6 互賴理論主要論點，請參考 R. O. Keohane and J.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D. Puchala 將歐體描述成「相互調和體系」(concordance system) 最為著名 (Puchala, 1972: 276-284)。根據 Puchala 的說法歐洲統合應被視為一種國家合作互動體系 (a system of cooperatively interacting states)。在這個體系之下，國家雖仍扮演重要角色，但超國家組織、次層級政府，和非國家團體仍是獨立自主的，因此不構成階層分明的國際權力結構。在權力分散的結構下，各獨立自主個體加強互動以尋求共識，並獲取共同利益。雖然在「相互調和體系」之衝突是無可避免的，但 Puchala 認為這些衝突不是根本利益的衝突。而是在無數功能性互動合作中，因對方法程序之見解不同而造成的。解決之道在於相互溝通瞭解，而不是脅迫和對抗。於是在 Puchala 的「相互調和體系」之下，資訊是充分的，因而欺騙和使詐是不容存在的。反之形成共識、務實政治、制式程序、妥協制度化、相互信任及合作則是推動統合的因素 (Chryssochoou et al., 1999: 30-34)。

另一個接近 T13 類理論的是「國際建制理論」。但不同 T13，國際建制理論傾向將國家視為單一實體，且是最重要的行動者。因此嚴格來說，它屬 T5 類理論。根據 S. D. Krasner 的定義，建制指在國際關係特殊領域中行動者之期望所匯集的一套明示或暗示的原則、慣例、規則，和決策程序 (Krasner, 1983: 2)。而歐盟，在該理論的眼中，不過是一個充滿具有拘束力的規則和慣例的國際建制。不過這些規則、慣例、原則和程序是因為行動者（即歐盟的會員國）為了解決「共同逆境」(common aversion) 和「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s) 兩種困境 (dilemma) 而逐漸形成的 (Krasner, 1991: 336-366)。因此行動者仍是解釋主體，但他們可能透過理性互動，或是學習和社會化過程而逐漸形成共同規範之共識。將歐盟視為一個國際建制也預設了其規則、慣例、原則和決策程序足以超越會員國之理性自利的考量而加以拘束。因此歐盟統合歷史儘管遭遇 1965 年法國「缺席杯葛」(empty chair policy)，1980 年代的英國對歐盟預算爭議，及 1992 年丹麥否決馬斯垂克條約等危機，但國際建制理論認為，歐盟統合過程所形成的共同規範、原則和程序，基本上仍然是受到法國、英國和丹麥所尊重的。蓋因上述三國並無脫離歐盟之意圖 (Chryssochoou et al., 1999: 25-27)。

不同於 T5, T6 類理論在分析層次上選擇歐盟體系為分析對象。T6 強調

行動者內化之意念、象徵、價值觀和道德規範如何塑造其偏好和改變其行為，進而解釋歐盟體系內機構的運作。在歐盟體系內，每一個行動者（執委會、歐洲議會、會員國等）都被視為單一行動主體，但其內化的價值觀和道德規範則會超越其本身理性自利考量而主導其行動。例如歐洲各國勞資關係的傳統不盡相同，但轉化至歐盟體系層次，則這些勞資傳統可強化或弱化既有的歐盟勞資政策(Crouch, 1993)。像德國和北歐傳統的新組合主義(neocorporatism)已逐漸透過其強勢產業帶進歐盟體系內。<sup>17</sup>另一方面歐盟共識型態的決策模式起先也與英國所習慣的對立政治文化不符。但隨著英國人與歐洲大陸人互動頻繁後，則歐陸決策模式也漸漸套用在英國的中央與地方關係。

如果一切遵循 T9 樹系，但在分析層次上選擇歐盟體系為分析對象，則我們可得 T10 類理論。T10 主要分析歐盟體系內政策如何被制定、利益團體如何遊說、歐盟官僚如何擴張其預算和職權，以及各會員國內之區域政府如何與歐盟執委會串連和結盟等現象。因此 T10 涵蓋許多不同的研究取向，例如運用政策社群和議題網絡 (policy community and issue network) 等架構去解釋歐盟的議程設定 (agenda setting) 和政策塑造 (policy shaping) (Richardson, 1996; Rhodes, 1990: 293–317; Peterson, 1995a: 76–80; Richardson, 1996)。像是歐盟的 ESPRIT 計畫 (即促進資訊科技之研究)，經由一個緊密結合的政策社群極力掌控，使該計畫之變動幅度很小 (Peterson, 1995b)。另一方面在環保和社會政策上，鬆散的議題網絡試圖影響歐盟決策，但最後政策結果卻難以預料 (Bomberg, 1994: 45–61)。又如運用利益團體理論去解釋遊說歐盟執委會和歐洲議會的現象 (Mazey and Richardson,

17 新組合主義有別於右派及法西斯威權主導下的國家組合主義(state corporatism)。新組合主義較近似 Philipp Schmitter 所稱的社會組合主義(societal corporatism)，強調勞、資，和政府三方面對於國家重大產業和經濟政策分享決策權。由於勞資雙方之層峰組織(peak organizations)大體能反應其成員利益，也能控制成員行動，故三方談判妥協的結果，由勞、資和政府分享治理的模式，確保德、奧、北歐諸國勞資和諧，使其生產活動不致中斷，故為其他國家所仿效的一個治理典範。參考 V. Bogdanor ed.,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 Blackwell, 1991), pp. 154–156; Iain McLean, *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12–125 & p. 340.

1993)。由於歐盟在組織及制度面上提供多重的影響管道，故許多利益團體非常願意將其遊說重心從國內轉至歐盟層次。據估計常設布魯塞爾的遊說團體數目從1985年的500個遽增到1992年的3000個(McLaughlin and Greenwood, 1995: 143-164)。歐盟遊說活動的遽增一方面固然由於單一歐洲法通過後，許多商業規範轉由歐盟制定。但另一方面歐陸各國內部採取『新組合主義』方式去協調勞資利益，使得利益團體的遊說空間有限(Streeck and Schmitter, 1991: 133-164)。有趣的是，歐盟利益團體的影響力並不像美國利益團體那樣的開放和平衡。反而由於產業部門的嚴格劃分，使得歐盟層次的「利益中介」(interest intermediation)逐漸傾向新組合主義方式(Kohler-Koch, 1994: 166-180; Falkner, 1999)。

另一方面歐盟會員國內之區域政府和地方政府，為了爭取歐洲區域發展基金(European Regional Development Funds, ERDF)之分配並影響歐盟共同區域政策，故紛紛在布魯塞爾設立代表處，從事遊說的工作。此外，隨著歐盟共同區域政策的提案、決策和執行階段的不同，區域政府、中央政府，和歐盟執委會不斷地合縱連橫，組成政策聯盟，以爭取最大的利益。這正是歐盟境內多重層級治理原則的展現(Mark, Ray, and Nielsen, 1996; 黃偉峰，2000: 9-47；Mazey, 1995: 78-100; Marks, Hooghe and Blank, 1996: 341-378)。同理，歐盟機構內部的技術官僚為了保護其職權和擴張其預算，於是逐步將歐盟構築成「規範國家」(regulatory state)。這個趨勢主要是由於官僚政治的供需原則使然。在供給面，歐盟執委會及其下之委員會有誘因去擴張單位預算，但受限於金額不大的歐盟總預算，故只好極大化其規範權力(regulatory power)。在需求面上，歐盟會員國為了節省執行法規的成本和解決「搭便車」(free-riding)的問題，故願意將規範權力授予執委會代為行使(Majone, 1994: 77-101; Majone, 1991: 79-101; Majone, 1996)。同樣地，為了解決「扈從」(principal-agent)關係所產生的問題，歐盟各會員國也願意將部分職權授權(delegate)給執委會代為執行(Pollack, 1997: 99-134)。

不同於T10，T14類理論容納非理性自利的動機，但仍以行動者之互動為解釋主軸。在分析歐盟體系之政策制定上，T14特別強調「知識社群」

(epistemic community) 和「倡議聯盟」(advocacy coalition) 的影響力。根據 P. Haas 的定義，知識社群是指在特殊領域內一群具有公認的知識素養的專業人士 (Haas, 1992: 187–224)。知識社群不但具有專業知識，他們還具有「共同」的因果信念、價值規範信仰、知識的效度觀念，和政策志業。知識社群之所以能影響政策後果是因為特殊領域內決策者對問題之不確定性使然。在此不確定性情況，決策者只能仰賴知識社群對問題的詮釋，以及其對政策後果的科學合理化解釋了。由於知識社群不但詮釋問題，更具有共同的價值觀和使命感，故往往能超越理性自利的考量和克服權力結構的障礙，將其理念轉化成政策。具體應用「知識社群」取向於歐洲單一市場和貨幣同盟者特別強調「歐洲產業圓桌論壇」(ERT) 和各國央行官員所扮演的專業角色 (Spindler, 1998)。

不同於「知識社群」，「倡議聯盟」的組成份子則較複雜。除了專業知識分子外，倡議聯盟尚包括民選官員、非民選技術官僚、利益團體之領導者、媒體工作者，以及其他具有「共同信仰系統」(shared belief system) 的行動者。倡議聯盟試圖影響的對象是與其信仰系統不同之政策掮客 (policy broker)，有時亦與知識社群競爭政策影響力。不同於知識社群，倡議聯盟之論述內容不止於專業知識，它也試圖用「政治論點」(political argument) 去影響決策者 (Sabatier, 1988: 129–168; Sabatier and Jenkins, 1993)。「倡議聯盟」取向曾被應用在歐盟的環保政策上。例如，由德國、丹麥和荷蘭等國，歐盟執委會第 11 總署 (DG XI, 主管環境) 和非政府的環保組織所組成的「倡議聯盟」主張在歐盟境內徵收二氧化碳稅和能源稅。儘管英國及某些南歐會員國極力反對，但這項建議仍持續在歐盟正式議程上討論達一年之久 (即 1993–4 年) (Peterson, 1995a: 79)。

然而不論是知識社群或倡議聯盟，兩者最可能發揮影響力的地方是歐盟次體系層級的委員會 (committee) 或工作小組 (working group)。有鑑於歐盟體系內委員會無所不在，又其對政策塑造、決定，和執行都有不同的影響力，學者已逐漸重視歐盟之「委員會治理」(committee governance) 的現象。雖然無人知道歐盟確切設立了多少個委員會 (因為其數目隨著歐洲整合需要隨時在變動)，但截至 1998 年止據估計歐盟共有約一千個委員會，參

與人數超過五萬人。其中有三分之二的委員會是由執委會設立的，而且大部分屬於技術和專業導向的委員會，制度化程度也較低（缺乏官方預算、無正式權力、也沒永久地位、秘書處或固定會址）。不過執委會下設的 70 個諮詢委員會（有關農業和社會部門）制度化程度則較高。另外部長理事會下設的 comitology 委員會則約占委員會總數的三分之一。其下又分成諮詢委員會（約 150 個）、管理委員會（約 60 個），和規範委員會（約 80 個）。就正式權力大小來看，規範委員會大於管理委員會，又大於諮詢委員會。另外，根據歐體／歐盟條約，理事會也設立幾個大委員會，如經社委員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ESC)、區域委員會(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COR)，及常駐代委員會(COREPER)。最後，歐洲議會為立法諮詢需求也設有幾個委員會(Schendelan, 1998: 5-6)。

除了委員會數目眾多外，這些委員會在歐盟決策過程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例如在議程設定上，由歐盟及會員國代表組成的協調性委員會乃扮演居中折衝和形成共識的重要角色。在決策階段，立法委員會、諮詢委員會，和理事會的工作小組則發揮政策塑造及簡化選項的功能。在政策執行階段，理事會的 comitology 委員會則扮演管理和規範的角色(Christiansen and Kirchner, 2000: 7)。由於委員會的性質不同，組成份子變動頗多，設立與撤除彈性大，又常遊走在正式權力和非正式影響力之間，故是知識社群和倡議聯盟力爭參與的對象，也是歐盟機構偏愛使用的政策工具。Christiansen 和 Kirchner 甚至認為歐盟的「委員會治理」與歐洲整合息息相關，因為委員會可被視為歐盟集體規則(collective rules)被制度化的產物；委員會也使文化專業背景不同的代表齊聚一堂，瞭解彼此立場；委員會也是歐洲整合過程中功能分化(functional specialization)的指標；委員會猶如歐盟其他機構缺乏透明度；委員會是歐盟多層級治理的一個重要環節。其餘這些特點，欲瞭解歐盟治理體系，則瞭解委員會運作是不可或缺的(Christiansen and Kirchner, 2000: 9-10)。然而目前針對歐盟的委員會之研究仍以個案研究為主，理論化程度較低。猶如將委員會置於歐盟體系之內，視為一個因素，再與其他因素重組分離，以啟發方法去解釋歐盟的決策。所以筆者將其置 T-14 理論型態之下。

類似於 T13 的互賴理論不願對歐洲統合結果下定論，T14 理論強調，歐盟政策制定的環境猶如一個「組織性的無政府狀態」(organized anarchy)，最能適用「垃圾桶決策模式」(garbage-can model of decision making)，而其最後政策產出充滿了不確定性 (Cohen, 1972: 1-25; Winn and Lord, 1997)。的確如果決策環境如垃圾桶般，則問題與解決方案常混淆不清。有時因問題去追求解決方案；有時卻先有解決方案再去尋找問題所在。此外，解決方案通常也是由嘗試錯誤中逐漸領悟。因其決策權力結構鬆散，故影響決策之成員的流動性很高。雖然歐盟的決策環境不盡然與「垃圾桶決策模型」相符，但有學者指出歐盟執委會之決策結構鬆散。像其常設之功能性總署常因某項政策已完成而轉而尋求其他功能。此外，在 1996-97 年之歐盟政府間會議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IGC)，有學者指出由於政府間談判過程相當鬆散，故其最後決議充滿不可預料的變數 (Mazey and Richardson, 1997: 111-113; Winn, 1998: 124)。而歐盟鬆散及破碎的決策環境也讓許多勇於創新的「政策企業家」(policy entrepreneurs) 提出嶄新的政策構想和意念，並協助決策者剔除非最適的政策選項 (Kingdom, 1984; Peters, 1997: 22-36)。

目前筆者已將歐盟政治中之本體論屬於個人主義觀的相關研究加以分類討論完畢。接著我們探討整體全面觀的相關理論。首先，T7 理論型態視國家為單一行動實體。其間的互動不見得是理性的，且由國際社會的結構所支配。於是歐盟體系的變遷只不過反映這個國際社會結構的內在邏輯及其辯證關係而已。較接近 T7 者如「新馬克斯主義」和「結構馬克斯主義」(structuralist-Marxism) 的國際關係理論。這派理論強調歐洲統合是為了回應新階段的資本主義發展。這個新發展包括全球經濟互賴、跨國資本的宰制、所有權與資本控制權的分離，與生產趨勢由第二級移轉至第三級製造等。於是資本主義國家乃利用區域統合來引進有利於資本家的跨國規範機制。因此，歐洲統合不過是國家所運用的策略去再生會員國內的資本主義結構罷了。而歐盟組織則是居於霸權地位的會員國之「政治上層結構」(Grahl and Teague, 1989: 33-49; Lankowski, 1993; Hix, 1994: 9)。

其次，如果一切遵照 T7 樹系，但將知識論假設改為理性，則可得 T3 理

論型態。較接近 T3 者如「歷史制度主義」。<sup>18</sup> 在歷史制度主義中，國家雖然不是唯一的研究單位，但它的決定卻是最重要的。應用於歐洲統合，國家最初建立超國家組織的決定便是最重要的分析始點。但另一方面，歷史制度主義非常強調歷史時間軸上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換言之，雖然行動者（如國家）有決定權，但其過去的決定將會限制其現在決定，使其不得不遵循某種歷史路徑。因此在本體論上，歷史制度主義較接近整體全面觀的世界。可是行動者對路徑的依賴是有其理性邏輯可言，特別是先前的決定已建立制度去減少交易成本，而制度的累積與交織可能創造「加成回收」(increasing returns)，使得制度具有黏性及穩定性(Pierson, 2000: 251-261)。而行動者如果要改變制度或轉換其他發展路徑，不是不可能，但卻會使其蒙受很大的損失。由於改變路徑的成本太大，而且延續路徑的回收加成，行動者的決定是受制於歷史路徑的結構中。往往行動者最初的本意受到「路徑依賴」的影響，使得後續的發展常有「出乎意料的結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為了更精確地陳述歷史制度主義，P. Pierson 發展三段論法：在 t<sub>0</sub> (時間點 0)，行動者依據既有的偏好，決定一套制度規則或政策。在 t<sub>1</sub>，受限於 t<sub>0</sub> 的制度規則，行動者形成新的偏好。在 t<sub>2</sub>，行動者根據 t<sub>1</sub> 新形成的偏好去選擇更新的制度規則或政策。由於在 t<sub>0</sub> 時行動者無法預知所設定的規則或政策對於 t<sub>1</sub> 的偏好形成的影響力。因此行動者早期的決定對於未來他們的互動會有出乎意料的結果。Pierson 依據歷史制度主義的路徑依賴邏輯成功地說明歐盟社會政策如何演變成今天的全貌 (Pierson, 1996: 123-163)。

除了歷史制度主義外，T3 尚可包括聯邦或邦聯建構論。該派理論將歐洲統合視為聯邦或邦聯的建構過程。主要研究單位是國家，建構的原理循著理性的實證法則。由於該理論預設歐洲統合的終點是聯邦或邦聯，因此所有的聯邦或邦聯經驗的建構邏輯都被視為未來歐洲統合可能的走向。在歐洲倡議聯邦制度最積極者莫過於 Spinelli (Spinelli and Rossi, 1967)。二次世界大

18 新制度的分歧和應用之相關評析，參考 M. D. Aspinwall and G. Schneider, "Same Menu, Separate Tables: The Institutional Turn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Stud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38, 2000, pp. 1-36.

戰之後，有感於民族主義相互毀滅的威力，也懼怕民族國家的絕對主權觀再度挑起戰端，而成為無政府狀態，Spinelli 及一些歐洲菁英遂提出聯邦主義來取代民族國家。因為他們認為聯邦主義可以使歐洲各國在自主與互賴，民主與效率，和單一與分歧等不同價值上取得平衡點。Spinelli 的建議是效仿「二元主義」(dualism) 的古典聯邦主義，即建構聯邦時需要在憲法上明白區分聯邦與邦互不侵犯的權限。而且該派主張民主機制所產生的歐洲聯邦議會是不可或缺的，並由其來監督聯邦政府，避免濫權。雖然聯邦政府實權有限，不過當時歐洲各國並無法立即放棄國家主權，使得 Spinelli 的理想變得遙不可及。於是才有 Monnet 的「功能性的聯邦主義」(functional federalism) 出現，其真義則是以功能統合為主要概念，但聯邦則是統合後的政治願景 (Chrysschoou, 1999: 14)。

聯邦主義是根據憲法程序由人民同意去建立一個超越國家且具實權的主體，故不獲歐洲各國青睞是可以預期的。可是邦聯則是依據條約所建立的一個鬆散的超國家組織。邦聯組成份子不但對邦聯運作具有最後決定權，而且隨時可以退出，因此是否歐洲各國可以接受呢 (Chrysschoou, 1999: 15-21)？其實歐洲統合的每一主要步驟向來是以條約來促成的。但是歐體條約所規定的權利義務遠超過邦聯所需，因此過去的研究都圍繞在界定歐盟的現狀是否屬於邦聯。例如 Keohane 和 Hoffmann 指出歐盟機構大體上遵從政府間的談判結果，旨在建立共同架構而非詳盡的法規，而且容許大量的各國差異。就這三項特質來說，歐盟與邦聯有相似處 (Keohane and Hoffmann, 1990)。Elazar 也認為歐盟是個結合舊有主權國家的新型態邦聯 (Elazar, 1987)。不過這樣的靜態分析完全忽略歐盟法制統合(legal integration)的動態及歐洲法院在憲法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於是近來有學者應用「建構主義」來探討歐盟會員國近乎聯邦的政治關係。該「建構主義」之聯邦理論已跳脫了歐洲統合是以政治聯邦為終點的目的論。轉而探討過去和現在的政治及法律實際運作如何建構具有聯邦特質的歐盟。雖然在馬斯垂克條約中並沒有「聯邦」字眼出現，但英、法、德等大國對於歐盟的聯邦發展趨勢卻有不同的認知。這亦展現「建構主義」所強調的「交互主觀意涵」(intersubjective meanings) 的重要性 (Koslowski, 1999: 561-578)。其實雖然歐體條約中不

具「聯邦」字眼，但 Weiler 指出歐體法的「直接效力」、「至上原則」、「隱含權力」(implied power)，及人權的相關規定已將歐體法和會員國國內法的關係綁死，使兩者的法律關係與憲政下的聯邦國家相似 (Weiler, 1994: 510–534; Weiler, 1991: 2413)。

T11 認為國際社會結構的變遷會對置身其內的行動者造成壓力，使其採取共同行動去化解。最明顯的例子是由於全球化與經濟互賴日益加深，國家往往不能單獨解決共同面臨的問題（如環境污染、武器擴散、資源開發等），因此國家必須結合其他國家，甚至跨國組織和民間團體來解決共同問題。有時國家並非最重要的行動者，反倒是跨國組織和團體可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不論如何，國際體系變遷所形成的功能上的需要是決定行動者行為的最重要因素。甚至我們可以說行動者只是因應功能上的需要而採取必要的手段和扮演應有的角色罷了。傳統的「結構功能主義」(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便是 T11 的典型 (Parsons, 1961)。應用在歐盟研究上，則以「功能主義」和「新功能主義」為主。

一般皆認為 Mitrany 是首位將「功能主義」運用在歐洲統合的重要人物 (Mitrany, 1943)。Mitrany 認為國際無政府狀態是造成世界動亂分歧的罪魁禍首，因此為了建立一個永久和平的世界秩序，我們「應該」試圖尋求經濟部門的統合和政治分工。特別是由專家組成的功能性議會「應該」取代非專家的地域性議會。另一方面則是透過功能統合解決共同問題。儘管 Mitrany 的主張具有規範性的意圖，但他所提倡的漸進式的功能統合則具有分析價值。簡言之，功能主義並不預設功能統合之後的終局政體形態為何。從其「功能決定形式」的基本教條來看，終局政體的形式是由功能統合程度來決定的。因此功能主義刻意避開政治敏感的主權問題，僅專注於經濟和產業的統合，以專業技術考量跳脫地域疆界的束縛，用以化解共同所面臨的挑戰。然而功能主義也有其盲點，尤其是功能主義首重辨識「共同利益」。一旦「共同利益」被發現後，國家或跨國行動者便會自動合作去解決問題。換言之，國際社會變遷的壓力會使國家認識功能性統合的需要，於是國際合作是自動產生的。但這與國際現實不盡相符，因此才有新功能主義的提出。

「新功能主義」汲取功能主義的精華，但卻加入兩個統合過程的要素，

即衝突與政策議題的「前瞻性連結」(forward linkages)。就衝突而言，新功能主義不認為國際合作會因共同的需要而自動自發。國際合作仍須克服集體行動邏輯的困境。而克服這個困境則須要小心設計統合的程序機制。如同功能主義般，新功能主義並不預設統合的終點。雖然 Haas 曾點明「政治社群」(political community) 是統合過程可能發生的狀態(即當政治忠誠轉移至新的權力中心)，但新功能主義卻不願對此多加著墨(Haas, 1958 & 1964)。反倒是該學說對於功能統合的動態過程有一套獨特的看法。新功能主義推廣「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 之概念。外溢效果包括三個層面：第一是功能層面，即技術的壓力趨使更進一步統合的需要；第二是政治層面，即各國菁英份子受到密集社會化而進一步要求統合；第三是培養 (cultivated) 層面，即官僚釋放誘因鼓吹統合。以歐洲統合為例，一旦煤鋼統合完畢後，就會有進一步統合其他相關產業的功能需求。於是統合一旦發動，它會從一個產業慢慢外溢到其他產業，從一個部門擴散到其他部門。是此，統合的過程會自我維持的。而保障統合過程不受中斷者便是超國家組織和制度的建立。由於超國家組織的建立，使得會員國之衝突制度化，透過超國家組織的官僚及跨國社會菁英不斷鼓吹誘導，使得統合層面會逐步涵蓋所有層面。當然新功能主義也遭到諸多批評。例如，該學說高估超國家組織及跨國菁英的影響力；忽略區域體系可能受到「歧異邏輯」(logic of diversity) 的影響；並未區分「低層政治」(low politics) 與「高層政治」(high politics) 對於功能性統合之阻礙；也無法完全解釋自 1960 年至 1987 年間歐洲統合停滯不前的現象。於是 Haas 本人曾對新功能主義做了重大修正 (Haas, 1975)。而 Lindberg 則提出「溢回」(spillback)，和「圍繞溢出」(spill around) 等概念予以補充，並試圖解釋 1960s-1970s 歐洲統合近似停滯的狀況 (Lindberg and Scheinglod, 1970)。

T15 則強調國際體系是個「社會建構現實」(social constructed reality)。因此歐洲統合是種「社會過程」(social process)。在這個過程中，會員國及其公民的社會化將影響政治抉擇的型態、政策發展走向，和特殊概念的瞭解。而評估社會化對歐盟的影響力之最佳方法則是採取「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 的觀點 (Christiansen, Jorgensen and Wiener, 1999: 528-

544)。「建構主義」並不是個實體理論，因此它無法與「新功能主義」、「新現實主義」或「自由派政府間主義」直接比較。「建構主義」是種形上理論 (meta-theory)。在本體論上，它完全無法認同個人主義觀。「建構主義」強調整體的「社會瞭解」 (social understanding) 和「語意體系」 (systems of meanings) 對於會員國和其公民的自我認同、利益認知，和具體行為之影響力。在知識論上，建構主義可與「理性主義」 (rationalism) 相容，兩者同時相信解釋現象的內在邏輯、因果關係，和通則化是可能的 (Risse and Wiener, 1999: 775–782)。但「建構主義」的許多分支並不堅持以理性的方式去解釋現象，有時這些分支理論則採取啟發式或反思式 (reflective) 的途徑去瞭解現象。T15 類的建構主義運用在歐盟上可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旨在探討規則 (rules)、習俗 (norms)，和制度在歐洲治理 (European governance) 結構中所扮的角色。這表面上 T15 與 T5 的國際建制理論相似。但國際建制理論強調行動者的期望會匯集在規則、習俗、制度，和社會行為規範上面，因此預設了行動者「交互主觀」 (intersubjective) 的特質。可是在方法上卻又採「實證主義」取向，將主體與客體分離，並由客體的力量推展行動者的社會互動 (Fratochwil and Ruggie, 1986: 753–775)。

反觀套用 A. Giddens 的結構型態理論 (structuration theory) 者，則主張主體與客體相互建構的關係。一方面歐洲統合被視為由日益龐雜的規則所建構的。沒有規則，或不遵守規則就沒有今天的歐盟 (Giddens, 1979)。於是探討歐洲統合的重心應在於瞭解法律與政治統合之間的動態關係，即 Weiler 所稱的「超國家主義的雙重特質」 (dual character of supranationalism)。早在 1991 年 Weiler 便指出歐體條約的憲法化 (constitutionalization) 與政府間主義決策機制之強化是同時進行的。他認為歐盟法律架構的制度化關閉了會員國「選擇性退出」 (selective exit) 之選項 (即無法退出歐盟但卻又想逃避條約義務)。但歐體法「至上原則」 (supremacy) 和「直接效力」 (direct effect) 又迫使會員國必須尊重歐洲法院之判決。在歐盟的法律架構下又無退出選項的情況，使得會員國格外的小心去從事政府間談判，儘量把持會員國自身的政策主導權力。於是談判時的衝突和僵局是不可避免的。但這也彰顯會員國對於歐盟法律架構的效力是有高度共識的 (Weiler,

1991: 2403–2483)。另一方面，存在於歐盟治理結構的規則和制度則進一步規範歐洲社會互動的建構過程。這可反映在研究判例的「司法化」(juridification) 的文獻中。例如歐體法優於會員國國內法的慣例已形成，於是會員國國內法院經常援引歐體條約第 177 條規定，去適用歐體法來判決國內相關訴訟 (Stone and Brunell, 1998: 63–81)。這可做為歐盟法律統合的指標。另外，歐洲法院的幾個重大判例已經被認為影響歐洲統合的方向與速度。例如歐洲法院的 *Cassis de Dijon* 的判決，觸發了歐盟執委會去動員利益團體遊說各會員國採行相互承認原則，因而促成歐洲市場標準化及趨同化 (Alter and Meunier-Aitsahalis, 1994: 535–561)。

「建構主義」的另一分支則主張以啟發或反思的方法去「瞭解」而非「解釋」歐洲統合。著重點則在於歐洲政體的建構與歐洲認同的塑造，並強調論述 (discourse)、溝通行動 (communicative action) 及意念 (idea) 的角色 (Christiansen, Joegensen, and Wiener, 1999: 540)。從這個角度來看，歐洲統合的動力不僅僅是民族國家，它尚包括歐洲公民及其他團體。統合不僅僅是造就了共同的政治經濟架構，它更是塑造歐洲公民、歐洲認同，和泛歐文化等概念。因此欲瞭解歐洲統合之全貌，首先必須探討歐洲政治認同的塑造。到底「歐洲認同」(European identity) 是否存在？它的本質為何？歐洲統合對各會員國之國家認同有何影響？在國家認同和文化背景差異之下，歐洲人的政治認同和政治文化如何產生？是否可能建構一個非同質性的「歐洲人社群」(community of Europeans) (Howe, 1995: 33–46; Smith, 1993: 129–135)？另一方面歐洲統合也逐漸形成「歐洲公民」(European citizenship) 的概念。這包括發展法律制度去保障歐盟公民權利，並透過社會化及符號政治的實際運作去重構泛歐層次的自我認同。是此，屬於「歐洲」的獨特「公民權利」運作方式也油然而生 (Wiener, 1998)。當然建構歐盟認同及公民概念也同時仰賴著非歐盟或非歐洲認同的建構。換言之，歐洲認同是建築在與其他不同地域認同的區隔上。可是這種區隔卻引發接納 (inclusion) 與排斥 (exclusion) 不同民族文化的大辯論 (Neumann and Welsh, 1991: 327–345)。

如果接受歐洲認同之形成的重要性，則語言和論述成為必要的工具。歐

洲統合至今數十年，所累積的特殊語詞恐怕只有圈內人才能理解。例如，「不對稱統合」(asymmetrical integration)、「退出選項」(opt-outs)、條約的支柱架構 (pillar structure)、多速歐洲 (multi-speed Europe) 等術語恐怕只有少數政治菁英才瞭解其確切意涵 (Schmitter, 1991)。然而運用歐洲統合的特有語詞進行論述卻進一步強化歐洲統合的既定方向。例如，「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輔助原則」(subsidiarity)，和「伙伴原則」(partnership principle) 所引發的論述，不但對於歐洲統合的方向而且對歐盟政策都有深厚影響 (Neunreither, 1993: 206-220)。「民主赤字」的憂慮強化歐洲議會職權，並要求執委會之行政透明化。而「輔助原則」的應用則一方面賦予會員國中央政府正當性去對抗歐盟執委會的干預，但另一方面則迫使中央權力下放至區域和地方政府的基層。於是從「建構主義」的觀點，我們看到歐洲統合對歐洲公民、語言、文化、認同，和論述之塑造，但另一方面這些語言、文化、論述、認同及公民權利的實際運作也影響歐洲統合之建構。

如果一切遵循 T15 樹系，但在分析層次上選擇體系層次，則我們得到 T16 理論型態。大致上「社會學派制度論」(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 可被歸類於 T16。「社會學派制度論」的「制度」是廣義的，包括正式的法規制度及非正式的規則、規範、習俗、意念、價值、文化和歷史觀等概念，並將其視為影響歐盟運作的獨立變數。該派學者認為制度不但會限制行動選項，而且會塑造偏好和界定利益所在，甚至建構行動者的自我認同 (DiMaggio and Powell, 1991)。應用在歐盟體系上，社會學派制度論認為歐盟體系運作與政策決定是受制於非正式的文化認知。例如不同會員國的某一行專業人士的文化認知可能較同一會員國但不同行專業人士的文化認知來得近，因此前者對歐盟政策可能採取較一致的立場。像在歐盟執委會工作的官僚，雖然來自不同國家，但其工作場所社會化會使其對歐洲統合採取較友善的文化認知，因此也較容易支持統合政策 (Zetterholm, 1994)。又如在歐盟境內，個人和公司逐漸形成不同的「文化框架」(cultural frames)。於是針對歐盟提出不同的「政體意念」(polity-ideas)，像是聯邦國家、經濟共同體、政策網絡，和跨政府政權等概念。這些「政體意念」則進而主導歐盟政策制定和組織互動 (Jachtenfuchs, Diez and Jung, 1997)。同樣地，在解釋歐洲

單一市場的形成，也有人以為歐盟執委會積極推動“Europe 1992”的「文化框架」認知是主要的動力（Fligstein, and Mara-Drita, 1996: 1-33）。

如果我們一切遵循 T16 樹系，但在知識論上選擇理性假設則可得 T12。T12 視歐盟為一完整政治體系，而且有其內在邏輯脈絡可尋。其研究單位不限於國家，尚包括其他非國家及次體系的行動者。然而從整體全面觀的角度，歐盟政治體系將會限制其成員之行動與選項。很明顯的 T12 是以政治社會學的體系理論（system theory）為主體。Easton 的政治體系輸入項、輸出項、轉換機制及回饋機制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概念（Easton, 1957: 383-400）。雖然目前並沒有人直接套用 Easton 體系理論來分析歐盟組織架構，但 Hix 仍將歐盟視為政治體系來分析其錯縱複雜的現象。Hix 強調歐盟是個政治體系而非國家，因為歐盟符合 Easton 和 Almond 所定義的政治體系特質：即(1)歐盟具有穩定且明顯的制度和規則做為決策和治理彼此間互動的準則；(2)歐盟境內的公民和社會團體透過體系內的政黨或利益團體等機制去達成其政治願望；(3)歐盟集體的決定明顯地影響境內經濟資源的配置和政治社會價值之分配；(4)歐盟境內的政治產出與新的需求之互動密切且持續。據此 Hix 提出其複雜版的歐盟政治體系，並逐一分析歐盟的行政、立法、司法部門，探究民意與政治分歧（political cleavage）；政黨、選舉與歐盟層次的民主；利益如何被匯集和代表；政策如何制定等現象（Hix, 1999）。簡單地說，Hix 告訴我們研究歐盟政治與研究一般政治體系無異。一般政治體系所關心的問題都可能在歐盟發生。

另一方面也有應用 Lipset 與 Rokkan 的民族建構論（theory of nation building）去分析歐盟體系的性質。根據 Lipset 和 Rokkan，社會及政治分歧是由歷史的「轉折點」（critical juncture）所造成（Lipset and Rokkan, 1967; Rokkan, 1970）。在本世紀的歐洲，這轉折點是指超國家統合及工業革命。超國家統合造成了「中心—邊陲」分歧（center-periphery cleavage）。爭執點在於進一步統合去促進整體歐洲利益，或是保護國家主權。工業革命則造成社會方面的「左—右」分歧（left-right cleavage），爭執點在於國家干預市場與財富重新分配的多寡。這類的社會分歧反映在歐盟層次上，使得歐盟在市場規範及區域發展政策的決策上蒙受泛政治化之苦。

最後我們探討 T8 理論。T8 將歐盟視為單一實體。進而詢問歐盟與個人之間的關係為何？由於本體論採整體全面觀，故歐盟做為一個實體對於個別公民具有結構性的影響力。但這個影響力並不見得可用理性的角度去解釋。T8 應用於歐盟研究上實在很少。勉強接近 T8 理論的是 Shackleton 套用文化理論去探討歐盟公民的生活型態到底屬於那一類 (Shackleton, 1991: 575-583)。Shackleton 首先辨識兩種個人與政治體系可能發生的關係。第一面向是指個人融入團體的程度為何。第二面向則是指個人生活受到外在限制的程度為何。根據這兩種面向的程度高與低，Shackleton 辨識了四種生活型態：即層級式的 (hierarchical)、致命式的 (fatalistic)、平等式的 (equalitarian)，和個人式的 (individualistic) 生活型態。他認為歐盟目前的制度及社會架構，即低度規範和高度統合模式，比較可能賦予其公民平等的生活方式。

如果僅將 T8 的知識論假設改為理性或具邏輯脈絡，則可得 T4。T4 基本上視歐盟為單一政治實體，而且其整體結構會影響其體系內組成份子的運作。問題是到底什麼是歐盟政體的本質呢？如果將歐盟視為獨一無二的政體，則也毫無比較的可能性。幸好過去的比較研究並不做如此假設。例如過去常將歐盟政體與聯邦政體相提並論，因此有的拿美國聯邦主義，有的以德國聯邦經驗，有的提出合作式聯邦 (cooperative federalism) 和連鎖式聯邦 (inter-locking federalism)，有的從歷史上的聯邦範例去描述歐盟政體的現狀 (Burgess, 2000; Mckay, 1997: 267-299)。另外也有從聯邦主義和「複合代表」 (compounded representation) 的概念探討歐盟與其會員國間的關係為何？會員國如何因應歐洲統合所帶來的垂直和水平地權力分立的衝擊？又既有的次區域認同和文化如何在歐盟架構下動員而獲得代表性？(Brzinski, Lancaster, and Tushchoof, 1999: 1-18; Schmidt, 1999: 19-44; Keating, 1999: 71-86) 學者也探討歐盟的執委會、理事會、歐洲法院到底是否扮演著類似聯邦部門的特質？而歐洲經濟暨貨幣統合的支柱架構和「區域歐洲」 (Europe of the Regions) 的概念是否彰顯聯邦政體的特質呢？(Burgess, 1996: 1-17)<sup>19</sup>

19 And see other articles in this special Issue.

除了將歐盟視為具聯邦特質的政體外，也有學者認為歐盟政體的本質是「協和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因為歐盟具備支柱化的社會(a pillarized society)、菁英主導控制、菁英的托拉斯、社會分支部門的自主性、比例原則、少數否決，和超大型聯合(oversize coalition)等協和式民主的特質(Lijphart, 1977; Lijphart, 1979: 499–515; Taylor, 1991: 109–125)。更進一步地學者提出「協和式邦聯」(confederal consociation)的概念來描述歐盟具有複合政體的特質，依據協和共識原則結盟(“union”)，但卻並沒有喪失民族認同和國家主權(Chryssochou, 1994: 1–14)。另一方面不少學者從傳統的比較法律和制度著手探討歐盟治理結構和決策架構。例如，借用現有的憲政體制的概念，Weiler探討歐體法的憲政議題，例如人權保障、公民權利、法制體系、歐盟民主架構及共同對外關係之權限等(Weiler, 1999)。然而比較其他實體法律的問題不在本文討範圍，故予以從略。

## 五、從研究取向之比較來釐清理論爭議之本質

根據上一節的陳述，筆者以表一將十六類理論型態之代表作列出，並註明其可能牽涉的實體理論及基本概念模型。接著我們將比較幾個廣為人知的理論爭議，並釐清其爭議本質。第一，聯邦主義與功能主義的爭議已行之有年，自從歐體草創之初即有上述兩種理論的大辯論。可是當初的辯論是意識型態的路線之爭，即到底歐洲統合「應該」採取聯邦主義？還是「應該」採取功能主義？後來我們雖然知道 Monnet 主導的功能性統合受到重用，但這並未告訴我們兩者理論層次的爭議點為何。從表一我們知道，功能主義與聯邦主義是無法直接比較的，因為兩者分析的層次不同。但功能主義卻與聯邦或邦聯建構論有極相近的理論基礎。功能主義採取功能性統合的策略，強調統合的多元面向。聯邦或邦聯建構論則傾向視國家為單一實體，並探討聯邦或邦聯建構的基本原則，進而設計歐洲聯邦或邦聯的政治架構。但兩者皆從結構面來看待歐洲統合。早期 Deutsch 所主張的「交流主義」則顯然與「功能主義」和「聯邦建構論」有異，因為「交流主義」更強調歐洲社會和公民所扮演的角色，並深信只有透過交流溝通，共同體意識才會形成。也唯有共

		超體系層次		體系層次	
		個人主義觀		個人主義觀	
一 理 性	T1 : (新)現實主義 政府間主義 自由派政府間主義 *Moravcsik (1993) *Scharpf (1988, 1996) *Schneider & Cederman (1994)	T3 : 歷史制度主義 聯邦及邦聯建構論 *Spinelli (1967) *Aspinwall & Schneider (2000) *Pierson (1996, 2000)	T2 : 理性抉擇制度論 條件式設定議程、權力 權力指標分析 *Tsebelis (1994) *Garret (1992) *Bendar, Ferejohn & Garrett (1996)	T4 : 比較聯邦主義 比較憲政制度 歐盟之自由民主正當性研究 協和式民主 *Burgess (1996, 2000) *Weiler (1999) *Taylor (1991) *Beetham and Lord (1998)	整體全面觀
一 元 質 體	T5 : 國際建制理論 *Krasner(1983, 1991) *Keohane(1989)	T7 : 新/結構馬克斯主義 *Grah & Teague (1989) *Lankowski (1994)	T6 : 行動者價值規範內化論 *Croch (1993) *Zetterholm (1994)	T8 : 文化理論 *Shackleton (1991)	
理 性	T9 : 交流主義 跨國關係 跨政府關係 *Keohane & Nye (1971) *Deutsch (1957)	T11 : (新)功能主義 *Mitrany (1943) *Hass (1958, 1975) *Lindberg and Scheingold (1970)	T10 : 政策社群和議題網路之模型 多重層級治理模型 規範國家 歐盟治理體系對會員國之影響 *Richardson (1996) *Rhodes (1990) *Peterson (1995) *Marks (1996) *Cowles, Caporaso, and Risse (2001)	T12 : 政治體系論 社會分歧理論 「歐洲化」對會員國政治體系之衝擊 *Hix (1999) *Easton (1965) *Lipset & Rokkan (1967) *Goetz and Hix (2001)	
多 元 質 體	T13 : 互賴理論 相互調和體系 *Puchala (1972) *Cameron (1995)	T15 : 建構主義 憲法化 司法化 歐洲認同 歐洲公民 *Christiansen & Wiener (1999) *Weiler (1991) *Howe (1995) *Smith (1993)	T14 : 知識社群 倡議聯盟 垃圾桶決策模式 委員會治理 *Spindler (1998) *Sabatier (1988, 1993) *Winn and Lord (1997) *Christiansen and Kirchner (2000) *Van Schendelen (1998)	T16 : 社會學派制度論 文化框架 政體概念 「歐洲化」對會員國政治體系之衝擊 *Jachtenfuchs, Diez & Jung (1997) *Fligstein & Mara-Drita (1996) *Goetz and Hix (2001)	

表一：十六種型態之實體理論與相關著作

同體意識的形成，歐洲統合才算成功。

晚近的理論爭議圍繞在「新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制度論」。反映在歐洲統合上則是「(自由派) 政府間主義」和「新功能主義」的爭執。新功能主義強調逐步地統合過程，而且這個過程會因功能上再生的需要而自我維持下去。但新功能主義並不假設功能外溢會自動發生。相反地，外溢效果必須透過菁英的社會化和超國家組織的官僚的推動才有可能。政府間主義則認為歐洲統合純屬國家談判的產物。新功能主義含蓄地表示歐洲統合會逐漸將會員國權限轉移至歐盟層次，故將使會員國主權管轄範圍縮小。但「政府間主義」則表示雖然主權有移轉共享的情形，但這也是會員國協商談判所得的「最大公約數」。在各自無法單獨處理問題，又必須結合其他友邦來解決共同問題時，會員國主權共享並不是主權權力的損失，而是增加會員國之權力。再則新功能主義強調超國家組織的自主性及菁英的重要性，但政府間主義則認為歐洲統合的方向和速度仍握在會員國中央政府的政客手中。最後，在偏好處理上，新功能主義認為功能上的需要會促使會員國改變絕對主權的偏好，轉向支持統合計畫。而歐盟機構和制度在統合過程中會形塑行動者的偏好。可是自由派政府間主義則認為國家是依據其內部不同利益團體所匯集的意見而界定國家利益及偏好。因此一旦國家利益和偏好確定後，會員國在歐盟條約談判中會極大化其國家利益。所以偏好在談判時是固定的，不受歐盟機構所影響。

表面上看來，新功能主義和（自由派）政府間主義的確有許多的差異。但從表一我們知道兩者的爭議其實掩蓋了其相似之處。例如，兩種理論其實都假設行動者是理性的，會循一定邏輯運作。雖然自由派政府間主義強調談判時國家是單一實體，但在偏好形成時該派理論並不堅持國家是單一實體。相反地，該派認為會員國內之利益團體的折衝是重要的。兩者的爭議本質其實源自本體論的差異。新功能主義強調歐盟結構功能的自主性，並認為這種自主性會塑造會員國和其他行動者的偏好，使其明白歐洲統合之好處，進而同意支持統合。但政府間主義則預設偏好早已存在，故統合與否的癥結端視條約談判是否能促進會員國之國家利益。而以會員國為主體的個人主義觀，根本與新功能主義的整體全面觀格格不入。於是兩者就歐洲統合主控權誰屬

之爭議根本沒有交集，甚至我們可以說兩者在此是本體論的「假爭議」（phony dispute）。

最近新功能主義又結合歷史制度主義圍攻自由派政府間主義。歷史制度主義其實與自由派政府間主義一樣，都是以會員國的決定為研究單位，且均視會員國彼此互動時為一元實體。但是歷史制度主義儘管同意自由派政府間主義的假設，認為會員國會理性的做出統合決定，但是歷史制度主義不認為會員國具備完全理性的考量能力。往往歷史時間點的區隔會使會員國無法預測未來的後果。於是會員國早先的決定雖是理性自利的，但因早先決定設定了爾後發展路徑，使得會員國無法任意的改變原先的決定。因「加成回收」和「路徑依賴」使得理性自利的會員國會一步步的走向緊密統合。從表一我們知道歷史制度主義在本體論上與新功能主義無異，只是在偏好形成上，歷史制度主義不但辨識功能統合的需要，也強調會員國目前時間點的偏好是受制於上一個時間點的決定。因此歷史制度主義已嚴重挑戰自由派政府間主義的非歷史性的（ahistorical）偏好形成論述。

從歐洲統合的原因到其結果，理論爭議依舊難分軒輊。延續「政府間主義」與「（新）功能主義」的爭論，歐洲統合到底對民族國家有何衝擊呢？（新）功能主義者認為，國家為了因應全球化及經濟互賴的功能需要，勢必將部分主權讓渡至超國家組織如歐盟。較極端者甚至認為民族國家所享受的固有權力終將被超國家組織所取代（Mitrany, 1943; Deutsch, 1957; Haas, 1958）。主張「政府間主義」者雖同意全球化及經濟互賴所帶來的功能需要，但卻認為國家對於彼此之間的統合仍然握有最後決定權。儘管國家將其部分主權讓渡，並共儲於超國家組織，可是個別國家的主權並未從此消逝，蓋因它可以隨時退出超國家組織而收回其主權。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國家只是讓渡其原本無法單獨處理的主權權力。透過主權權力之共儲共享，使國家變得更強而有力。因此歐洲統合不但沒有削弱會員國之主權，反而增加其主權權力（Moravcsik, 1994; Taylor, 1983）。從經驗資料來看，歐洲統合並未削弱民族國家的主角角色。Hoffmann 便指出，統合同時削弱民族國家片面行動的能力，但卻又鞏固其在國際體系的主角地位（Hoffman, 1983: 21-37）。Lindberg 和 Scheingold 早在 1970 年也指出會員國及歐盟超國家組織是處

於共生的關係，同樣因為統合的過程而興盛強大（Lindberg and Scheingold, 1970: 308–310）。

不過上述的觀點皆假設民族國家是單一行動個體，因此只問及統合是否增強或削弱國家的權力。殊不知如果將研究單位（即國家）視為多元實體，則統合對國家之影響則不僅是其權力增強或削弱的問題，而是那些國家單位的權力有所轉變？Gary Marks 認為歐洲統合已造成一個「多層級治理」體系（Marks, Hooghe and Blank, 1996: 341–378）。在這個體系中國家仍是最重要的機構。但隨著統合的深化和集體決定的制度化，國家在其領土內的治理能力漸失。不但如此，國家匯集和傳遞其內部利益至國際社會的能力也減弱。因此區域和地方政府也能參與國家和超國家層級的事務。但區域和地方政府的涉獵有多深，則視政策議題的性質而定，例如國防外交政策，不但地方政府之影響力有限，就連歐盟超國家組織也不一定插得上手。另一方面，在共同區域發展政策上，區域和地方政府則扮演重要的角色。儘管如此，區域和地方政府結合歐盟執委會來削弱會員國的中央政府權力並非一成不變的事實。端視區域發展的政策提議、預算編列與分配，和政策執行之程序不同，會員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歐盟機構會合縱連橫，形成動態策略聯盟，以遂其目的（黃偉峰，2000: 9–47）。換言之，「多層級治理」體系並不表示會員國中央政府權力必然被架空。該體系只是陳述歐盟的治理架構絕非國家和超國家組織所獨占。相反地，區域和地方政府，以及非政府之行動者仍有參與的可能性。

歐盟之「多層級治理」體系其實潛藏著不同層級治理機構的衝突緊張關係。到底超國家組織的決定是否適用於會員國？如何適用？這些問題涉及到歐盟治理架構之法制化及憲法化的程度。對 Weiler 來說歐洲統合已使歐盟從國際組織轉化成一個自成體系的法律建制（legal regime）。其中，歐體法至上原則、直接效力原則，和隱含權力的確立，使得歐洲法院積極做出有利於統合的判決，於是操縱歐洲統合的方向和速度（Weiler, 1991: 2406–2407, 2413–2417）。從會員國的角度來看，歐洲法院的判決多少已封殺了會員國規避履行條約的選項。尤有甚者，會員國的司法體系已逐漸融入歐洲法院的司法審查體系。所以即使會員國政府可以不理會歐洲法院的判決，但卻不能忽

略其本國法院的判決之拘束力。換言之，歐體法的司法救濟體系已將歐體條約的義務國家化，而使得會員國養成遵守歐體法的習慣。綜觀來看，歐體的「法律統合」(legal integration) 已使主張「政府間主義」者無法解釋為何歐洲法院判決會違反會員國之利益及偏好 (Burley and Mattli, 1993: 41–76)。儘管歐洲法院曾做出不利於某些會員國之判決，但 Taylor 認為會員國之主權並未受損，因為會員國仍可隨時退出而不接受歐洲法院之判決。Taylor 指出歐體法在會員國的直接效力並不表示該法至高無上。歐體法之效力可以源自國家對國際條約義務的遵守，由會員國之憲政慣例對條約的處理方式來決定其效力。因此會員國之憲政慣例高於歐體法 (Taylor, 1983: 276–281)。況且 Weiler 也指出歐體的司法審查程序較傾向「政府間主義」的運作方式，以及歐體層次的執法單位之闕如都使得歐體之法制化不見得削弱會員國權力 (Weiler, 1991: 2419–2420)。

目前國家權力是否因統合而增強或削弱之爭論已到瓶頸，有待進一步經驗資料來突破。可是伴隨而來的卻是兩個體系層次的問題。第一，歐洲統合是否已轉化會員國之角色功能、決策過程、行政機制，和政治文化及認同？這便是所謂的歐洲化 (Europeanization) 的問題。第二，歐盟政治體系之正當性 (legitimacy) 的問題。但要回答這兩個問題，我們必須界定到底歐盟體系如何運作呢？目前的共識是歐盟是個沒有政府的治理架構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Wallace, 1996: 3–36; Rhodes, 1996: 652–667)。不同於「政府」、「治理」不是指任何特定的組織，而是指達成具有拘束力決定之所有方法和途徑。因此「治理」的概念是包括「政府」這樣的實體組織，但卻又超越「政府」而包括其他不同的途徑和方法 (Kohler-Koch, 1999: 14)。歐盟之所以是一個沒有政府之治理架構，因為所謂「主權人民」(sovereign people) 只有在個別會員國內才具有主權；代議民主的慣例並不逾越會員國之疆界；人民的政治授權並不是直接針對歐盟層次的決策機構。可是歐盟層次的決策決定卻對各個成員國之公民具有拘束力。從這個角度來看，歐盟體系雖無政府，但是人民卻已「被治理」(governed) 了 (Kohler-Koch, 1999: 15)。

歐盟既然有權制定政策拘束會員國之公民，但又似乎不受到民主程序的

約束，則其正當性何在？端視研究者切入之角度，歐盟之正當性可以來自(1)會員國政府的民主素質的高低；(2)歐盟體系政策產出（output）之表現；以及(3)被治理的歐洲公民之直接同意（consent）。早期羅馬條約之下的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大致符合前兩項民主正當性的標準。一方面歐盟體系之政策產出具有效率。因為會員國無法單獨解決共同問題，故歐盟政策產出具有正當性。另一方面，任何歐盟的決策不是落於條約授權範圍內，就是必須透過會員國一致決才能成立。既然所有會員國皆握有最後決定權，而其政府又是循民主程序產生因而會員國之公民仍對歐盟體系具有間接之拘束力。是此，歐盟體系仍具有間接之民主正當性（Beetham and Lord, 1998: 15-33）。

可是隨著歐盟體系之深化，以及條件多數決的擴大適用，則上述兩種民主正當性受到挑戰。原因是多數會員國之意志可以決定歐盟政策之走向，又約束少數無法苟同之會員國。於是居於少數之會員國公民的主權權力已被危害。引進歐洲議會議員之直選或許讓歐洲公民有機會對歐盟體系行使直接同意權，但是歐洲議會本身的決策權力受到極大的限制。儘管近來歐洲議會之權力擴張，但其內之黨團運作方式使其無法有效的參與立法和監督執委會。因此，歐洲公民參與歐洲議會選舉之意願不高，這個事實加深歐盟體系「民主赤字」之負面印象。另一方面，隨著歐盟決策程序的複雜化，使得會員國及其公民無從監督其運作。往往歐盟如迷宮般的決策程序及規範體系，連專家都搞不清楚其決策重心何在。也使得會員國無從歸屬其政策產出之責任（accountability）。因此執委會之行政透明化便成為減輕「民主赤字」的方法之一。

但有人以為不論是歐洲議會直接民選，或是執委會的行政透明化都無法改善歐盟的「民主赤字」。首先，歐盟體制下並無「人民」（demos），因此並無所謂歐盟民主或民主化的問題。特別是德國憲法法院判決中所界定的「人民」（volk）是種族群心理的集體認同，在歷史上現代國家成立之前便已存在。<sup>20</sup> 是此德國之所以成為現代民族國家，那是因為早已存在德國「人民」

20 BverfGE 89, 155. Maastricht-Verdict. 1993.

(Weiler, 1995: 10–15)。按照這種邏輯，只有「歐盟人民」之集體認同事先存在才有可能談歐盟之民主。畢竟「民主」之「民」是指具有集體認同者的自我統治。歐盟既無集體認同的「人民」，便稱不上自我統治。此刻就算給予歐盟境內所有公民投票決定歐洲議會組成的權利也無濟於事。尤有甚者，增加歐洲議會的權力反而危害歐盟之正當性。因為一個沒有「人民」的議會，不但在概念上不可能，而且實際上易造成專制。

針對這種說法 Weiler 提出反駁。他認為德國法院所界定的「人民」過於偏狹。並非「人民」的集體認同都是預先存在的族群心理狀態。實際上「人民」的集體認同可以是國家社會成立後所刻意建構的 (Weiler, 1995: 16–19)。例如，美國「人民」的集體認同可僅止於對其憲法之認同，與種族心理狀態無關。又如，對一國家的集體認同可以建築在公民 (civic) 的權利義務上。並非所有國家公民權之取得都以血統文化為基準。有些國家公民權之取得是以出生地為準，與血統文化無關。另一方面，J. Habermas 也指出民主社群內的人民自我認同並不是以歷史文化為共同前提。環顧現代歐洲民族國家之人民自我認同是建築在民主過程中不同輿論之交錯表達和辯論溝通 (Habermas, 1996: 264)。換言之，歐盟之「民主赤字」問題並不因歐盟之下無「人民」而不存在。反倒是由所謂「歐盟人民」(EU demos) 正因無泛歐的民主運行而不得催生。

從上述對歐盟正當性的理論爭議中，我們發現主要爭論點在於本體論和研究單位的差異。學者若將歐盟視為一元實體，則衡量其正當性的標準多半與衡量民族國家正當性之標準雷同。特別是民族國家之「自由民主正當性」(liberal-democratic legitimacy) 常被用來檢視歐盟的正當性。<sup>21</sup> 而心理認同、體系表現，及政治參與等三部分則同時成為衡量歐盟正當性的指標。三者必須同時具備，則歐盟之「自由民主正當性」始可成立。而且三者具備之程度則以民族國家在這三項指標的成就做為衡量尺度。反觀，若將歐盟視為多元實體，則其正當性來源則較多元。它可以指心理認同、體系表現，或政

21 「自由民主正當性」的基礎是「憲政法治」(constitutional rule of law)。D. Beetham and C. Lord, *Legitimac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London: Longman, 1998), p. 9.

治參與等任一指標之具備即可。舉例來說，只要歐盟治理體系之政策產出透明又有效率，則即使其公民在歐盟層次的政治參與較低亦無傷其正當性。這便是 Majone 之「規範性政權」的正當性說辭。另一方面，歐盟正當性的理論爭議也涉及本體論之差異。德國法院對歐盟民主赤字的看法是採取個人主義觀的本體論，即個人的歐洲認同未確立前是無所謂歐盟「人民」，故也就不存在民主赤字的問題。但 Weiler 的反駁則採整體全面觀之本體論，即歐洲認同是由歐盟的民主制度結構及其運作中而孕育出來的，故歐盟必須健全其民主機制，包括釐清憲政架構和權力分配，以及提振其人民在歐盟層次之政治參與。歐盟目前所召開之「憲法大會」(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基本上便是要從制度面解決其正當性的問題。而其背後則是基於整體全面觀之本體論，同時也將歐盟視為多元實體。

另一個體系層次的爭論是所謂「歐洲化」的現象。「歐洲化」是指在整體歐洲層次「出現」(emergence)或發展出一套獨特的治理架構(Risse, Cowles, and Caporaso, 2001)。早期的研究專注於描述和解釋歐盟治理體系的出現及其性質特徵。特別是針對在歐洲層次如何建立超國家組織，如何制定歐盟政策，以及泛歐利益團體如何遊說等。<sup>22</sup> 主要的研究方法則包括政府間主義、新功能主義、歷史制度主義、社會建構論、理性決策制度論，和政策網絡取向等。然而自 1990 年代中期以後，學者已將研究重心轉移至「歐洲化」對會員國政治體系所造成之衝擊。到底歐洲統合和歐盟政策如何影響會員國之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等各層面呢？又會員國如何調適「歐洲化」所帶來的衝擊呢？不同於早期的研究視「歐洲化」為依變數來探究其形成之原因，目前之研究則將「歐洲化」視為自變項去探究其對會員國政治體系所造成的衝擊。例如，Knill 試圖解釋既有的歐盟政策如何影響其會員國之行政體制的變革和調適 (Knill, 2001)。又如 Meny, Muller 和 Quermonne 探究布魯塞爾的政策活動如何影響各會員國之政策制定過程 (Meny, Muller and Quermnne, 1996)。Heritier, Knill 和 Mingers 分析歐盟環境政策如何影響各會員國之環境規範建制 (Heritier, Knill and Mingers, 1996)。Kohler-

22 例如本文分類架構中的 T2, T10, T12, T15 等類型的論文。

Koch 和 Eising 探討歐盟如何影響各會員國區域政府之重組和區域發展政策 (Kohler-Koch and Eising, 1999)。而 Haverland 則關注會員國如何執行歐盟法規 (Haverland, 1999)。最近編輯出版的兩本書則全面性地探討「歐洲化」如何影響各會員國之政黨體系、抗議運動、利益團體網絡、政治溝通，及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門。也分析「歐洲化」如何影響各會員國之性別平等政策、交通政策、電信政策，和公共財政政策，以及行政傳統、法律體系、區域和地方政府架構、政商關係，和公民權之認知等 (Gotz and Hix, 2001; Cowles, Caporaso and Risse, 2001)。

雖然學界大致同意「歐洲化」對各會員國之政治體系造成衝擊，但對於「歐洲化」如何衝擊和會員國如何調適則沒有共識。有學者發現歐盟政策已使得各會員國之政策形態和結構趨向一致 (convergence) (Schneider, 2001)。但亦有學者認為「歐洲化」對會員國之衝擊不可等同而論。端視政策性質及國別差異，「歐洲化」不見得產生趨同或趨異之壓力，而會員國之調適方式也不一 (Heritier, Kerwer, Knill, Lehmkuhl and Teutsch, 2001; Caporaso, Cowles, and Risse, 2001)。不但如此，學者也爭論「歐洲化」是否構成會員國回應調適之充要條件。例如 Risse, Cowles, Caporaso 認為「歐洲化」只是會員國調適之必要但非充分條件。「歐洲化」是否能促使會員國調適端視五項「媒介因素」 (mediating factors)，即會員國內之政治結構的多重否決點、催化改革的正式組織制度、各國之組織文化和政策制定文化、國內行動者所掌握資源的多寡，和學習能力。但 Heritier 和 Knill 則認為「歐洲化」並不構成會員國調適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充分條件。因為他們發現即使歐盟政策與會員國政策完全契合，會員國仍從事內部改革。因此「歐洲化」，一如「全球化」或其他外來壓力，只是提供會員國政治人物機會去達成其個人政治目標罷了。因此會員國回應「歐洲化」的方式和程度端視會員國國內政治人物之意願、偏好，和信仰體系，以及會員國內之「政治機會結構」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以上對於「歐洲化」之理論爭議實可運用本文之分類架構加以分析。一方面就「歐洲化」現象的產生，有的學者是運用超體系層次的理論，如新功能主義和政府間主義來探究歐盟超國家組織的建構。但對歐盟政策之制定，

大部分學者仍使用體系層次的理論，例如理性抉擇制度、政策網絡取向，和政治體系論等。不過亦有學者以新功能主義的「功能外溢」和「政府間主義」之「談判理論」來說明歐盟政策制定過程。就本體論來說，探討「歐洲化」現象的產生大多採個人主義觀，但亦有採整體全觀之本體論，例如新功能主義和政治體系論。在方法論上，我們發現學者大多採用「理性」假設，但建構主義則採啓發假設。

另一方面，若將「歐洲化」視為自變數而探討其會員國政治體系的衝擊，則學者分析層次立刻降至體系層次的論述，旨在探討體系及次體系成員互動。但就研究單位而言，有學者將「歐洲化」的現象視為一元實體，例如將歐體法律體系視為一元實體來探討會員國司法體系的回應。又如將歐盟治理體系視為一元實體來探究會員國政策權限之移轉。也有將歐盟特定政策視為一元實體（如貨幣政策）來研究會員國如何回應。但大部分學者則將「歐洲化」視為多元現象，故其影響力並不一致。例如歐盟的共同區域政策和共同農業政策是由許多不同政策組成的，因此其對會員國之區域政策和農業政策之影響也不一致。又如將歐盟治理體系視為政策網絡，基本上便預設不同政策性質之政策網絡對於會員國相關政策之衝擊不一，故回應方式也不會一致。

在本體論上，「歐洲化」既被視為自變數，則學者很自然地採整體全面觀。因為「歐洲化」做為一個整體現象定義較明確，而對其影響力之推論也較容易。例如若歐盟被視為一個政治體系，則可利用體系理論的「輸入」、「輸出」和「回饋」等概念來分析體系內成員之互動。又歐盟若被視為一個民主政體，則所有民主政體之特徵都可被用來檢視歐盟，例如民主正當性之研究。但若採行個人主義觀之本體論，則「歐洲化」對會員國之衝擊將是片面的，而且可能是間接的。例如將「歐洲化」視為會員國回應之必要而非充分條件之研究，基本上不認為「歐洲化」是一種整體不可分割之現象。這些研究認為「歐洲化」只是「全球化」或其他外來因素的一部分。而且「歐洲化」之所以對會員國造成衝擊還必要受到「媒介因素」的制約，例如會員國之制度結構、政治人物之偏好和信仰系統，以及「政治機會結構」等。另外持個人主義觀者也將會員國之回應措施進一步做為「歐洲化」之因，來探究「歐洲化」現

象之深化或變遷。例如 Stone Sweet, Fligstein 和 Sandholtz 等的研究便發現歐盟境內會員國間之貿易額和會員國法院適用歐洲法院之「前置判決」會增加歐盟超國家治理之權責。但歐盟超國家治理權責之加重則會反過來促進歐盟境內之貿易額，於是可能進一步增加貿易訴訟，而會員國法院援引歐洲法院之前置判決之事例又增加，造成歐盟超國家治理權責則進一步加重 (Sandholtz and Sweet, 1998; Sweet, Sandholtz, and Fligstein, 2001)。所以超國家治理與會員國貿易和歐體法律適用是互為因果的關係。但不論採行個人主義觀或整體全面觀之本體論，學者在方法論上也有分歧。但大部分研究均持理性假設，認為會員國理性地回應「歐洲化」之衝擊。這種理性回應預設了會員國政治體系之內在邏輯和行動者之理性抉擇。但是亦有研究指出會員國回應「歐洲化」的衝擊是啟發性質的，例如「歐洲認同」和「歐洲文化」之研究便發現「歐洲化」並不等同於「歐洲認同」和「歐洲文化」之形成。會員國人民在文化和認同層次的回應不如會員國在制度和治理上的回應來得理性，具有一致邏輯可循。

## 六、結論

本文首先界定「歐盟政治」之定義和研究範疇。其次，筆者就現有的理論方法之分類架構提出批判，並依研究單位、分析層次、本體論，和知識論等區隔提出一套新的分類架構。再則運用本文之分類架構對於日益複雜之歐盟政治理論和方法加以分類，並列舉評析各類型理論方法之代表作。讀者可從本文這部分的評述中瞭解歐盟政治研究之多樣性，以及其理論方法之複雜程度。最後再從理論方法之分類比較來釐清目前歐盟政治研究之理論爭議。例如新功能主義、自由派政府間主義，和歷史制度主義等針對歐洲統合爭議。又如歐洲統合對於會員國主權喪失之爭議，歐盟治理體系的性質及其民主正當性之爭議，以及「歐洲化」之理論爭議等皆可由本文之分類架構來釐清其爭議本質。透過有系統地分類比較現有歐盟政治研究之理論與方法，讀者一方面可理解歐盟研究中理論爭議的本質，另一方面讀者也可瞭解現有歐盟研究中何種理論方法曾運用在解釋何種歐盟政治現象。於是本文之重要性在於

提供歐盟研究學者一個系統性的理論與方法之工具箱。有了這個理論方法的工具箱，歐盟研究學者不但可以採用適當犀利的分析工具去解釋歐盟政治現象，而且學者也可從歐盟政治的實證研究去進一步修正現有的理論方法。因此本文的具體貢獻是對「歐盟政治」的整個研究領域提出一個清晰的分類比較架構。並運用這個分類比較架構來釐清當前歐盟政治研究之理論爭議。然而本文並非一篇完整的文獻探討論文，也不應被要求納入所有的相關研究文獻。但筆者認為本文分類架構中所評析之論文著作已含蓋大部分理論類型之歐盟研究著作。因此讀者應可藉由本文掌握歐盟政治研究之現狀。類似本文性質之論文在國內外均相當闕如。如前所述，在國外 Simon Hix 曾於 1994 年及 1998 年的論文綜合評述歐盟研究之各途徑，但是事隔多年其分類架構不但廣受批評而且已不足以區隔日益複雜之歐盟政治理論與方法。另一方面，隨著歐盟之深化與廣化，歐盟研究內容已增加了許多以往學者不曾思索的課題。因此本文對歐盟政治理論方法的分類比較正好適時彌補這類研究的空缺。也希望學界透過本文能重視歐盟研究之理論建構和應用。

## 參考資料

- Allison, L.  
1996 "Power," in I. Mclean (ed.), *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396-399.
- Almond, G.A.  
1990 *A Discipline Divided: Schools and Sects in Political Sciences*. London: Sage.
- Alter, K. J. and S. Meunier-Aitsahalia  
1994 "Judicial Politics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Pathbreaking Cassis de Dijon Decis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6(4): 535-561.
- Aspinwall, M. D. and G. Schneider  
2000 "Same Menu, Separate Tables: The Institutional Turn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Stud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8: 1-36.
- Bachrach, P. and M.S. Baratz  
1962 "The Two Faces of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6: 947-952.

- Bednar, J., J. Ferejohn, G. Garrett,  
1996 "The Politics of European Federalism,"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 16: 279-294.
- Beetham, D. and C. Lord  
1998 "Legitimac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in A. Weale and M. Neutwich (eds.),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London: Routledge, pp. 15-33.  
1998 *Legitimac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London: Longman, p. 9.
- Blondel, J.  
1976 *Thinking Politically*. Harmondsworth: Penguin.
- Bogdanor, V. (ed.)  
1991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 Blackwell.
- Bomberg, E.  
1994 "Policy Networks on the Periphery: EU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Scotland," *Regional Politics and Policy* 4: 45-61.
-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zinski, J. B., T. D. Lancaster, C. Tuschhoof  
1999 "Federalism and Compounded Representation: Key Concepts and Project," *Publius* 29(1): pp. 1-18.
- Burgess, M. (ed.)  
1996 "Introduction: Federalism and Building the European Union," Special Issue, *Publius* 26(4): pp. 1-17.
- Burgess, M.  
2000 *Federalism and European Union: The Building of Europe, 1950-2000*. London: Routledge.
- Burley, A-M. and W. Mattli  
1993 "Europe Before the Court: A Political Theory of Legal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7(1): 41-76.
- Cameron, D.  
1995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in T. Risse-Kappen (ed.), *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 Non-State Actors, Domestic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poraso, J., M. Cowles, and T. Risse (eds.)  
2001 *Transforming Europe.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hristiansen, T. K., E. Jorgensen and A. Wiener  
1999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urop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6(4): 528-544.
- Christiansen, T. and E. Kirchner (ed.)  
2000 *Committee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p. 7.

- Chryssochoou, D. N.
- 1994 "Democracy and Symbiosis in the European Union: Towards a Confederal Consociation?" *West European Politics* 1-14.
- 1995 "European Union and the Dynamics of Confederal Consociation: Problems and Prospects for a Democratic Future,"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18(2-3): 279-305.
- Chryssochoou, D. N., M. J. Tsirisizelis, S. Stavridis and K. Ifantis
- 1999 *Theory and Reform in the European Un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Cohen, M. D. et al.,
- 1972 "A Garbage Can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Choic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7(1): 1-25.
- Crouch, C.
- 1993 *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European State Tradition*. Oxford: Clarendon.
- Dahl, R. A.
- 1969 "The Concept of Power," in R. Bell, D. M. Edwards, and R. H. Wagner (eds.), *Political Power: A Reader in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Free Press, p. 80.
- Deutsch, K. et al.
- 1957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eutsch, K. W.
- 1957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DiMaggio, P. and W. Powell (eds.)
- 1991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inan, D.
- 1999 *Ever Closer Union*. London: Lynne Rienner.
- Easton, D.
- 1957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System," *World Politics* 9(5): 383-400.
- 1965 *A System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New York: John Wiley.
- Elazar, D. J.
- 1987 *Exploring Federalism*.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 Falkner, G.
- 1999 "Corporatism, Pluralism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 Impact on National Interest Intermedi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uropean Forum, Robert Schuman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ies*,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Florence, Italy, 25 November, 1999.
- Fligstein, N. and I. Mara-Drita
- 1996 "How to Create a Market: Reflections on the Attempt to Create a Single Market in the European Un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 1-33.

- Friedkin, N.E.
- 1998 *A Structural Theory of Social Influ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 Gallie, W. B.
- 1956 "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s," *Proceedings of Aristotelian Society*, pp. 55-56.
- Garrett, G.
- 1992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oice: The European Community's Internal Marke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 553-560.
- Garrett, G.M., I. Mclean and M. Machover
- 1995 "Power, Power Indices, and Blocking Power: A Comment on Johnst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5: 563-568.
- Gaventa, J.
- 1982 *Power and Powerlessness: Quiescence and Rebellion in an Appalachian Valley*.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Giddens, A.
-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oetz, K. H. and S. Hix
- 2001 *Europeanised Politics?* London: Frank Cass.
- Grahl, J. and P. Teague
- 1989 "The Cost of Neo-Liberal Europe," *New Left Review* (114): 33-49.
- Haas, E.
- 1958 *The Uniting of Europ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as, E. B.
- 1964 *Beyond the Nation State: 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75 *The Obsolescenc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y*. Berkeley, C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 Haas, P. M.
- 1992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 187-224.
- Habermas, J.
- 1996 "Reply to Grimm," in P. Gowan and P. Anderson (eds.), *The Question of Europe*. London: Verso, p. 264.
- Haverland, Markus.
- 1999 *National Autonomy,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Packaging Waste*. Amsterdam: Thela Thesis.
- Heritier, A., C. Knill, and S. Mingers
- 1996 *Ringing the Changes in Europe. Regulatory Competi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ate*. Berlin: de Gruyter.
- Heritier, Adrienne, Dieter Kerwer, Christoph Knill, Dirk Lehmkuhl and Michael Teutsch
- 2001 *Differential Europe. New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for National Policy*.

- Making.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Herne, K. and H. Nurmi
- 1993 "The Distribution of A Priori: Voting Power in the EC Council of Minister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ECPR, Leiden 1993.
- Hix, S.
- 1994 "The Study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The Challenge to Comparative Politic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17(1): 1-30.
- 1996 "CP, IR and the EU! A Rejoinder to Hurrell and Menon," *West European Politics* 19(4): 802-804.
- 1998 "The Study of the European Union II: The 'New Governance' Agenda and Its Rival,"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5(1): 38-65.
- 1999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European Un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Hoffman, S.
- 1983 "Reflections on the Nation-State in Western Europe Today,"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21(1): 21-37.
- Hosli, M. O.
- 1995 "The Balance Between Small and Large: Effects of a Double Majority System on Voting Power in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9: 351-370.
- 1996 "Coalitions and Power: Effects of Qualified Majority Voting in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34: 255-273
- 1997 "Voting Strength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 and of Partisan Actor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1: 351-366.
- 1999 "Power, Connected Coalitions and Efficiency: Challenges to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 371-391.
- Howe, P.
- 1995 "A Community of Europeans: The Requisite Underpinning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33: 33-46.
- Hurrell, A. and A. Menon
- 1996 "Politics Like Any Other? Comparative Polit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Study of the EU," *West European Politics* 19(2): 386-402.
- Jachtenfuchs, M., M. Diez, and S. Jung
- 1997 "Ideas and Integration: Conflicting Models of a Legitimate European Political Orde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f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Studies Association*, 29 May-1 June 1997.
- Johnston, R. J.
- 1995 "The Conflict over Qualified Majority Voting in the European Council of Ministers: An Analysis of the UK Negotiating Stance Using Power Indic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5: 245-254.
- Keating, M.
- 1999 "Asymmetrical Government: Multi-national State in an Integrating Europe,"

- Publius* 29(1): 71–86.
- Keohane, R. (ed.)  
1986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eohane, R. O. and J. S. Nye, Jr.  
1977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 Keohane, R. O. and J. S. Nye, Jr. (ed.)  
1971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ing, G., R. O. Keohane and S. Verba  
1994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ingdom, J.  
1984 *Agendas, Alternatives and Public Policy*. Glenville: Harper Collins.
- Knill, C.  
2001 *The Europeanisat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oehane, R. and S. Hoffmann  
1990 “Conclusion,” in W. Wallace (ed.), *The Dynam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Kohler-koch, B.  
1994 “Changing Patterns of Interest Intermedi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9: 166–180.  
1999 “The Evol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Governance,” in B. Kohler-Koch and R. Eising (e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London: Routledge, p. 14.
- Kohler-Koch, B. and R. Eising (eds.)  
1999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London: Routledge.
- Koslowski, R.  
1999 “A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he European Union as a Federal Polit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6(4): 561–578.
- Krasner, S. D.  
1983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ring Variables,” in Krasner, *International Regimes*.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2.  
1991 “National Power: Life on the Pareto Frontier,” *World Politics* 43: 336–366.  
1983 *International Regimes*.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ratochwil, F. and J. G. Ruggie  
1986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 State of the Art on an Art of the St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0: 753–775.
- Kreppel, A.  
2002 “Moving Beyond Procedur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European Parliament

- Legislative Influenc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5: 784-813.
- Kreppel, A. and G. Tsebelis  
1999 "Coalition Formation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2(8): 933-966.
- Laffan, B.  
1998 "The European Union: A Distinctive Model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5(2): 235-253.
- Lankowski, C. (ed.)  
1993 *Germany and the EC after the Cold War: Hegemony and Containmen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Lasswell, H. D.  
1936 *Politics: Who Gets What, When and How*. New York: McGraw-Hill.
- Layder, D.  
1981 *Structure, Interaction,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nel.
- Lijphart, A.  
1977 *Democracy in Plural Societies: A Comparative Exploration*. New Haw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Consociation and Federation: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Linkages,"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2(3): 499-515.
- Lindberg and S. Scheinglod  
1970 *Europe's World be Polity*. Englewood Cliffs, N.J.: Printice-Hall.
- Lipset, S. M. and S. Rokkan  
1967 "Cleavages Structure, Party System and Voter Alignments: An Introduction," in Lipset, S.M. and S. Rokkan, *Party System and Voter Alignments: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Free Press.
- Lukes, S.  
1974 *Power: A Radical Review*. London: MacMillan.
- Majone, G.  
1991 "Cross-National Sources of Regulatory Policy Making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11: 79-101.  
1994 "The Rise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in Europ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17: 77-101.  
1996 *Regulating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 March, J. G. and J. P. Olsen  
1989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 The Organizational Basis of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 Mark, G.  
1997 "Debate: Does the European Union Represent an N of 1? <<http://www.pitt.edu/~ecsal101/nldebate.htm>>, pp. 3-4.
- Marks, G., L. Hooghe and K. Blank  
1996 "European Integration from the 1980s: State-Centric v. Multi-Level Governance,"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34(3): 341-378.

- Marks, G., J. Salk, L. Ray, and F. Nielsen  
1996 "Competence, Cracks and Conflicts: Regional Mobiliz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in G. Marks, F. W. Scharpf, P. C. Schmitter and W. Streeck (eds.),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London: Sage.
- Mazey, S.  
1995 "Regional Lobbying in the New Europe," in M. Rhodes (ed.), *The Regions and the New Europ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pp. 78-100.
- Mazey, S. and J. J. Richardson (eds.)  
1993 *Lobbying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zey, S. and J. Richardson  
1997 "Policy Framing: Interest Groups and the Lead up to the 1996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0(3): 111-113.
- Mckay, D.  
1999 *Federalism and European Un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cLaughlin, A. and J. Greenwood  
1995 "The Management of Interest Represent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33(1): 143-156.
- Mclean, Iain  
1996 *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ény, Y., Muller and Quermnne (eds.)  
1996 *Adjusting to Europe. The Impact of the European Union on 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London: Routledge.
- Mitrany, D.  
1943 *A Working Peace System. An Argument for the Functional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London: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Moravcsik, A.  
1997 "Debate: Does the European Union Represent an N of 1?" <<http://www.pitt.edu/~ecsal101/nldebate.htm>>, p. 5.  
1993 "Preferences and Power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 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t Approach,"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31: 473-524.  
1994 "Why the European Community Strengthens the Stat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Working Paper Series # 52. Dept.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1994.
- Neumann, I. and J. Welsh  
1991 "The 'Other' in European Identity: An Addendum to the Literature on International Socie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7: 327-345.
- Neunreither, K-H  
1993 "Subsidiarity as a Guiding Principle for European Community Activities,"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8: 206-220.
- Nye, J.  
1971 *Peace in Parts*. New York: Little, Brown.

- Parsons, T.
- 1961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 Peters, B. G.
- 1997 "Escaping the Joint-Decision Trap: Repetition and Sectoral Politics on the EU,"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0(2): 22-36.
- Peterson, J.
- 1995a "Decision-Mak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Toward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1): 69-93.
- 1995b "European Union R & O Policy: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 in S. Mazey and C. Rhodes (eds.), *The State of the European Union* Vol. 3. Boulder: Lynne Reinner.
- Pierson, P.
- 1996 "The Path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A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nalysi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9(2): 123-163.
- 2000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4(2): 251-261.
- Pollack, M.
- 1997 "Delegation, Agency, and Agenda Setting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1: 99-134.
- Pollack, M. A.
- 1997 "Debate: Does the European Union Represent an N of 1?" *ECSA Review* 10(3): 1-5.
- Puchala, D. J.
- 1972 "Of Blind Men, Elephants and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10: 276-284.
- Putman, R. D.
- 1988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2: 427-461.
- Rhodes, R. A. W.
- 1996 "The New Governance: Governing without Government," *Political Studies* 44(4): 652-667.
- 1990 "Policy Networks: A British Perspectiv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2: 293-317.
- Richardson, J. (ed.),
- 1996 *European Union: Power and Policy Making*. London: Routledge.
- Richardson, J.
- 1996 "Actor-based Models of National and EU Policy-Making," in H. Kassim and A. Menon (ed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National Industrial*. London: Routledge.
- Risse, T. and A. Wiener
- 1999 "Something Rotten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 A Comment on Comment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6(5): 775-782.

- Risse, T., M. G. Cowles, and J. Caporaso
- 2001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Introduction," in M. G. Cowles, J. Caporaso, and T. Risse (eds.), *Transforming Europ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Risse-Kappen, T.
- 1996 "Exploring the Nature of the Bea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Meet the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34(1): 53–80.
- 1996 "IR Theory,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and the EU,"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34: 62.
- Rokkan, S.
- 1970 "Nation-Building, Cleavage Formation and the Structuring of Mass Politics," in Rokkan et al., *Citizens, Elections, and Parties*. Bergen: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Books.
- Sabatier, P. A.
- 1988 "An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of Policy Change and the Role of Policy-Orientated Learning Therein," *Policy Sciences* 21: 129–168.
- Sabatier, P. A. and H. C. Jenkins (eds.)
- 1993 *Policy Change and Learning: An Advocacy Coalition Approach*. Boulder: Westview.
- Sandholtz, W. and A. Stone Sweet
- 2001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Supranational Govern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andholtz, W. and J. Zysman
- 1989 "1992: Recasting the European Bargain," *World Politics* 42: 95–128.
- Sandholtz, W.
- 1996 "Membership Matters: Limits of the Functional Approach to European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34(3): 403–429.
- Scharpf, F. W.
- 1988 "The Joint-Decision Trap: Lessons From German Federalism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66: 277–304.
- 1996 "Negative and Positive Integration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uropean Welfare States," in G. Mark, F. W. Scharpf, P. C. Schmitter and W. Streeck (eds.),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London: Sage.
- Schendelan, M.P.C.M.
- 1998 *Van EU Committees as Influential Policymakers*. Aldershot: Ashgate, pp. 5–6.
- Schmidt, V. A.
- 1999 "European 'Federalism' and Its Encroachments on National Institutions," *Publius* 29(1): 19–44.
- Schmitter, P.
- 1991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s a New and Novel Form of Political Domination," Working Paper No. 91/28. Madrid: Juan March Institute.

- Schmitter, P. C.
- 1996 "Imagining the Future of the Euro-polity with the Help of New Concepts," in G. Mark, F. W. Scharpf, P. C. Schmitter and W. Streeck (eds.),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London: Sage.
- Schneider, G. and L-E Cederman
- 1994 "The Change of Tide in Political Cooperation: A Limited Information Mode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8(4): 633-662.
- Schneider, V.
- 2001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Telecommunications: The European Union in Transnational Policy Diffusion," in James A. Caporaso, Maria Green Cowles and Thomas Risse (eds.), *Transforming European.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hackleton, M.
- 1991 "The European Community Between Three Ways of Life: A Cultural Analysi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29(6): 575-583.
- Singer, D.
- 1969 "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 Rosenau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A Reader in Research and Theory*. New York: Free Press.
- Smith, A. D.
- 1993 "A Europe of Nations—or the Nation of Europ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0: 129-135.
- Spindler, M.
- 1998 "Regionalism in Europe and Asia Pacific Compared: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Advocacy Coalitions in the Making of Economic Polic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Beyond Liberalization*, Florence, Italy, 15-16 October, 1998.
- Spinelli, A. and E. Rossi
- 1967 "European Union in the Resistance,"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3): 321-329.
- Streeck, W. and P. C. Schmitter
- 1991 "From National Corporation to Transnational Pluralism: Organized Interests in the Single European Market," *Politics and Society* 2: 133-164.
- Sweet, A. Stone and J. A. Caporaso
- 1998 "From free Trade to Supranational Polity: The European Court and Integration," in W. Sandholtz and A. Stone Sweet (eds.),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Supranational Govern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weet, A. Stone and T. Brunell
- 1998 "Constructing a Supranational Constitution: Dispute Resolution and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2(1): 63-81.

- Sweet, A. Stone, W. Sandholtz, and N. Fligstein  
2001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P.  
1982 "Intergovernmentalism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in the 1970s: Patterns and Perspectiv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6: 741-766.  
1983 *The Limit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the State: Assumptions, Theories, and Proposi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7(2): 109-125.
- Tsebelis, G.  
1994 "The Power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s a Conditional Agenda-Sett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 128-142.
- Wallace, H.  
1996 "Politics and Policy in the EU: The Challenge of Governance," in Wallace and Wallace (eds.), *Policy Mak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3-36.
- Wallace, W.  
1983 "Less Than a Federation, More Than a Regime: The Community as a Political System," in H. Wallace, W. Wallace and C. Webb, (eds.), *Policy-Making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2nd ed. London: Wiley.  
1996 "Government without Statehood: The Unstable Equilibrium," in H. Wallace and W. Wallace eds., *Policy Mak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439-460.
- Weiler, J.  
1991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 *Yale Law Journal* 100: 2403-2483.  
1994 "A Quiet Revolution: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and Its Interlocutor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6(4): 510-534.  
1999 *The Constitution of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eiler, J.H.H.  
1995 "European Democracy and Its Critique," in J. Hayward (ed.),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 in Europe*. London: Frank Cass, pp. 10-15.
- Wendt, A. E.  
1987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1(3): 337-338.
- Wessels, W.  
1997 "An Ever Closer Fusion? A Dynamic Macropolitical View on Integration Proces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267-299.
- Wiener, A.  
1998 "*European Citizenship*" Practice: *Building Institutions of a Non-Stat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Winn, N.  
1998 "Who Gets What, When and How? The Contested Conceptual and Disciplinary Nature of Governance and Policy-Mak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Poli-*

- tics 18(2): 124.
- Winn N. and C. Lord  
1997 “Garbage Cans or Rational Decision? Member Governments, Supra-National Actors and the Shaping of the Agenda for the IGC,” paper presented to the *British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Leeds, 15–17 December, 1997.
- Zetterholm, S. (ed.)  
1994 *National Culture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Exploratory Essays on Cultural Diversity and Common Policies*. Oxford: Berg.
- 王國璋  
1994 〈依功能整合理論回顧西歐核能共同體之發展〉，《美歐月刊》9(5): 51–71。
- 洪德欽  
1998 〈歐洲聯盟之理論與實踐：方法論之分析研究〉，載於沈玄池、洪德欽（編），《歐洲聯盟：理論與政策》，頁 1–85。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 張亞中  
1998 《歐洲統合：政府間主義與超國家主義的互動》。台北：揚智。
- 黃偉峰  
2000 〈歐盟共同區域政策及其對區域動員之影響〉，載於洪德欽主編，《歐盟經貿政策》，頁 9–47。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 盧倩儀  
1997 〈區域整合理論之比較與評析〉，《美歐季刊》12(1): 27–44。

# Classifying and Comparing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to the Politics of the European Union

David W. F. Huang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 ABSTRACT

Studies on the European Union (EU) have gradually become multi-disciplinary in nature, as many researchers have brought in theories and methods from their own disciplines. However, without systematically classifying and comparing these theories and methods, scholars are often overwhelmed by the sheer complexity of theoretical debates over the politics of the EU. In this paper, I seek to redress this problem by first defining the research parameters of EU politics. Next, based on four criteria—unit of research, level of analysis, ontology, and epistemology—I classify theories into sixteen categories. Then, various academic works on EU politics are placed into each of these sixteen categories to highlight their theoretical attributes. Finally, major theoretical debates in the field of EU studies are analyzed.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many theoretical debates over EU politics are no more than phony wars among scholars who employ different units and levels of analysis, as well as different ontological or epistemological positions. By classifying and clarifying theoretical variants and debates, this paper offers a valuable tool kit of methods and approaches for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of EU politics.

**Key Words:** European Union, level of analysis, neo-functionalism, 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m,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multi-level governance